

编余专递

于幼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特质》认为,在当前,随着经济上跳跃式的高速发展,人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成为我国现代化突出的制约因素,这是初级阶段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任务。文章基于文化发展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又要受社会实践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既在总体上不能脱离、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又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度超前,以引导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提升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只能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相比,在理想、精神、原则实现的范围和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别,在价值观、道德观的具体内涵和要求上也有差异,而具有其特质内涵。文章据此从“应该是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统一的文化”等六个方面探讨、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特质内涵。

狄萌清、郑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安全问题研究》,认为入关对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说,意味着部分地放弃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使民族工业暴露于跨国公司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我国应谨慎审视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由于世界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文章指出,由于入关后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很可能引发诸如国有企业困难进一步加深、银行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失业率继续上升、财政压力增大、就业保障体系资金来源出现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消化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实施自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有效保护中逐渐加大开放力度,促使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成长壮大,从而奠定中国独立、强大、坚实的经济基础。

赵兴彬《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得与失》,认为目前史学界对过去的反思,多是微观重于宏观,即使宏观考察,也多从纵向或史学史的角度入手,这不利于发挥史学理论的透视威力。而如果我们以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大势作为参照系,横向地剖析当代中国史学,就会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脉络。文章即据此归纳出了当代中国史学成就的五个标志,并且指出近年来存在的六点不足。

张广智《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通过比较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历史的研究,指出,历史地看,宗教的精神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思想上对人们重塑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宗教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传承显示了这种文化的特有魅力和自身的创造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还会随历史的发展而继续生存下去。在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宗教因适应人们多元的精神需求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里,粗暴的干涉与放任自流,都是不足为训的。

目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哲学•

5 /于幼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特质

18/坚 毅：要素——结构——功能
——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之八

22/贾春峰：可贵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
评介

•经济学 管理学•

24/潘保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综合思考

29/狄荫清 郑 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经
济安全问题研究

36/符正平：论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

40/张浩良：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的一部力作
——卢泰宏《信息资源管理》评述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

43/黄锦奎：在新的价值世界创造财富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述评

录

•社会科学五十年•

48/张江明：回顾五十年 跨入新世纪

•历史学•

51/赵兴彬：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得与失

58/吴雁南：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开新

62/张广智：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
——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
论中心

69/李玲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考辨
——与陈新业先生商榷

•文学 语言学•

71/陈永正：《乐章集校注》辨误

77/李凤亮：面向 21 世纪的比较文艺学
——访博士导师饶芃子教授

81/王吉辉：论旧词语

•公民教育研究•

87/周 燕：关于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
——兼谈学校公民教育的负效应

92/冯增俊 马建国：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
材及特色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7, 1999

-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mentary Social Period Yu Youjun(5)
- Essencial Factor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 Three Dimentional System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ategories Jian Yi(18)
- An Introduction to a New Book ‘Nr.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al Construction’ Jia Chunfeng(22)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Pan Baohua(24)
- About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Economy after Its Entranc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World’s Trade Di Yinqing and Zheng Gang(29)
- New Development of Porter’s Theory on Competition Priority Fu Zhengping(36)
- My Good Impression of Lu Taihong’s Work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Zhang Haoliang(40)
- A Comment on the Articles Solicited for ‘Knowledge Economy and Project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Huang Jinkui(43)
- A Look Back into the Last 50 Years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Century Zhang Jiangming(48)
- Gains and Losses in Current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Zhao Xingbin(51)
- How Inheriting and Exploiting Chinese Tradictional Culture Wu Yannan(58)
- Religional Force: Christain’s Spread in Modern China and Korea
..... Zhang Guangzhi(62)
- An Inquiry of Mr. Chen Yexin about the First Speaker of ‘Rejecting All Learned
Schools Except Confucianism’(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Li Lingsong(69)
- Errors of Explanation in ‘Annotations on Yue Zhang Ji’(《乐章集校注》)
..... Chen Yongzheng(71)
- Professor Rao Pengzi’s Talk about Comparativ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eories with a Reporter Li Fengliang(77)
- On Old Wor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ng Jihui(81)
- About the Connnotations of Civic Education at School Zhou Yan(87)
- On the Textbooks of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 in Hong Kong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Feng Zengjun and Ma Jianguo(92)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①的特质

□于幼军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 广州 510082)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文化 特质

[摘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探讨、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特质,提出其特质内涵:一是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统一的;二是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三是弘扬科学精神与倡导人文精神统一的;四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尚未成熟完备的初级形态的;五是适应并引导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六是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05-13

文化是一定历史社会的产物,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某种社会形态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历史,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在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发展变革紧密相连。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必然要求、也一定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进程所决定,这一阶段不是短暂的过渡时期,而是起码上百年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而需要具有与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等状况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和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考察一个国家、民族某

一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必须从该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状况等出发。同时又要从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互动、辩证关系中去把握。文化发展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又要受社会实践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既在总体上不能脱离、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又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度超前,以引导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继续提升发展。

根据上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由现阶段社会经济基础和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但又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状况,决定这一阶段的文化只能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中、高级阶

段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相比,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精神、原则实现的范围和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别,在价值观、道德观的具体内涵和要求上也有差异。其特质内涵可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考察、认识和把握。

一、应该是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统一的文化

文化首先具有民族性的特征。文化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以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来分布的。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正是以不同的文化区别开来。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维系该民族的纽带和凝聚力,它在世代传承中积累和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是无法割断的历史链条。人类文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以各国、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作为载体和基础;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精神财富的积累发展和整个世界的文明进步,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然而,文化又从属于一定时代,具有时代性特征。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要被该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因素所决定,因而打上时代的印记;要受到所处时代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影响,必须与时俱进,才有生机活力。尤其是在人类历史已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特征,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当代,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更是要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发

展。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提出并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概念。他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以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分析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世界历史的形成,使每个文明国家及社会成员都需要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结束了过去各民族(国家)间孤立隔绝的状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都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封闭隔绝的状态下进行,都需要与其它民族国家发生交往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揭示了世界文化统一性的发展趋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泛指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因此,这里的“世界文学”也可理解为“世界文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进程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科学性。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交通通讯高度发达和大工业及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端倪的出现,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

流合作日益频繁广泛。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必须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特征的同时,积极学习、吸纳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来完善、丰富并更新发展。

因此,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要继承弘扬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华,保留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同时,又要自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趋势,进而审视和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走向,把握我国现阶段文化的内涵和任务。要以开阔的视野、健康的心态和“融汇百川”、“兼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现代以来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先进的思想文化,寓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于民族文化之中,使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融汇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切不可因把握不准世界文化进步的方向或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特色而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然而,在此过程中,又要十分注意以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鉴别,抵御外来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对民族肌体的侵蚀。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确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和“拿来主义”的原则,结合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的特点,学习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整合和融汇创新。只有这样,我国现阶段的文化才能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与世俱新,既符合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精神原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切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潮流,形成和发展既是民族的,又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新文化。

二、应该是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人民大众的文化”^④是指文化的人民性。它要求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维护、捍卫人民的利益,为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以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的能力服务。

文艺、文化从其最初起源看,就具有人民性的特点。郭沫若 1945 年曾撰文论述道:“文艺从它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古代文艺,不管是史诗、传说、神话,都是人民大众的东西。……社会有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化,文艺才逐渐为上层所垄断,庙堂文艺成为文艺的主流,人民文艺便被萎缩了。但人民文艺不断地在抬头,不断地和庙堂文艺斗争。一部文艺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⑤

中华民族文化素有人民性的传统。作为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源流的儒、道二家以及对早期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影响较大的墨家,都有非常丰富的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要爱民(“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养民(“养民也惠”)、利民(“因民之利而利之”),以及富民、教民、安民等思想。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鲜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⑥的观点。道家始祖老子也提出要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⑦),不要扰民,鱼肉百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⑧)。墨家思想中“爱民”、“利民”、“重民”的特

色亦非常突出,认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⑨。主张治理国家举贤尚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⑩,“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⑪,体现了重民的思想。此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思想,还大量地在文学、艺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如:《诗经》和屈原、杜甫、白居易等忧时忧世、忧国忧民的诗作,关汉卿的戏曲,施耐庵、曹雪芹、鲁迅的小说,等等。这些深受人民欢迎的传世佳作,无不浸润了人民性的思想。然而,在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利益冒充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强加给人民群众,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使文化的人民性受到压抑和摧残,无法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实现。

我国现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结束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政体。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同时也为文化的人民性的真正和彻底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大众既是文化创造、建设的主体,又是文化服务的对象。因此,我国现阶段文化的内涵和要求,文化建设发展的目的、任务都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与此相适应,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

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⑫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判断文化成果和文化建设的根本标准。

在我国现阶段,为人民服务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是一致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和道路,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通过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因此,从我国现阶段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一特质和内涵出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另一方面,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又是思想理论创造、文艺创作和各类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源泉。文化只有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反映人民大众创造美好新生活的伟大实践,才能受到人民的欢迎,才有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⑬因此,广大理论、文艺、文化工作者必须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自觉贴近人民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了解和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语言艺术,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吸取营养,撷取素材。并要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对人民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文化发展自身的

规律和特点,使之体现在创作思想深刻、学术和艺术精湛的优秀精神产品,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三、应该是把弘扬科学精神与倡导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的科学的文化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一是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面临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繁重任务;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应承担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由这两大历史任务所决定,我国现阶段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落后意识。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充分认识和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已经证明,科学精神是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进而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主导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推动科学进步,推动科技长入经济,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没有科学精神的弘扬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业化、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疑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进步,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然而,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进步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片面强调科学主义,忽视人文精神的建设,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和功利化,崇尚金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物欲横流,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充斥社会等各种社会弊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是过分强调科技力量可以使人类征服和战胜大自然,做出许多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滥用和浪费资源的蠢事,结果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国家成功的经验,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就要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加强现代人文精神的建设,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它关注并维护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等方面。它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目的等等,体现了人类主体对人生理想和价值意义的追求,是人类文化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我国现阶段在全社会努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应大力倡导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趋势和现代化的规律进程相一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和目的,坚持和体现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发展人和完善人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尊重和维护人的权利、利益和人格,承认并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劳动权、休息权和发展权,尊重社会成员对幸福人生追求,同时又要求社会成员对社

会承担责任、作出贡献,关心和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行自立自强、民主平等、公正诚信、友爱互助等道德准则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同时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个人的合法利益,把国家、人民和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以勤劳节俭、艰苦创业、求是务实、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创业精神;以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等等。

我国现阶段在全社会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现代人文精神,可以从多方面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合力,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对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负面作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由于发育不成熟及内在某些方面的缺陷而对人的本性、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造成的扭曲变形现象,起纠偏和防范的作用,引导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可以唤醒人们超越对金钱、物质的狭隘视野和偏执心态,去追求更为全面、科学的人生价值和高尚的道德理想,拓展丰富的人生内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由过去以财富积累、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观念转变到追求社会全面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发展观上来。

此外,在我国现阶段,弘扬科学精神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反对和清除封建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落后意识。我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文化占据正统地位,可谓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冲击,封建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

治地位已经崩溃。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社会上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其影响和作用已较新中国成立以前大为削弱、缩小,但却仍然是根深蒂固,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发生影响和作用。对其进行彻底的清除绝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这是因为,一方面思想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发展变化一般来说总是滞后于社会存在,不会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变更立即发生变化。当旧的思想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瓦解之后,它的某些因素还会长期在社会上残留,有些甚至还会渗进新的思想文化中保存下来,“旧瓶装新酒”,以新的包装出现。另一方面,在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农业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不发达国家。这种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客观上给封建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无法彻底铲除滋长封建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的土壤。

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建国前后我党曾经犯过的家长制、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等错误,还是当前大量存在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或愚昧落后的行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封建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中找到根源。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一直未能把它摆到应有的突出位置上。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我们没有及时、持久地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彻底的清理批判,而是过早地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锋芒转向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甚至是不自觉地

把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去批判资本主义。这一过早转向是不适当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产阶级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中占极少数,其思想文化在国民中的影响和作用,也远不如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广泛、深刻和顽固。因此,在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本应适时进行以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彻底肃清其影响为要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作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以全面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过早转移了目标,使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像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那样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彻底的、摧毁性的打击,以致留下隐患。对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总结:“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⑭

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必须在反对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予高度的重视;必须旗帜鲜明地继续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在反对资产阶级消极腐朽思想的同时,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作为长期的、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认真、深入、持久地批判、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以至彻底肃清其对社会肌体的侵蚀和影响。

四、应该是尚未成熟完备的初级形

态的社会主义文化

我国现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就其核心和主体而言,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它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因而,它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有本质的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不同,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则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二是指导思想的不同,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都以剥削阶级的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则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三是文化的核心和特征不同,封建主义文化以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为特征,资本主义文化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和特征,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则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初级阶段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续和发展。两者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文化,同样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由于两者所处社会的性质不同(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任务不同(前者是解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新中国;后者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主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代特征不同(前者是革命与战争年代,后者是和平与发展时期),因而文化建设的内容和任务不同,前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文化,动员激励人民大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者是建设与社会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新文化,动员、激励人民建设美好的新生活。因此,两者在特质、内涵、功能上均有区别。

在明确我国现阶段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同属一种社会形态,观念形态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又由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状况和历史任务的不同,因而在观念形态文化上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和不同的具体内涵。由我国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状况所决定,在这一阶段,如同经济、政治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样,文化也只能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文化为发展方向和理想目标。在这一阶段的文化建设中,应该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倡导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引导教育社会成员追求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崇高理想和目标,以及少数先进分子自觉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实践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但却不宜把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作为现阶段可以普遍实行的原则和要求,向全体社会成员提出,并据以要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因为,在这一阶段尚未具备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文化

在全社会普遍实行的条件。如果硬要在全社会普遍推行,只能“欲速则不达”,不但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还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以为一种思想道德文化在社会的实行不需要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都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⑮毛泽东也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论述过新民主主义方针、纲领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⑯因此,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方向,又要切实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忽视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思想道德文化方面的差异,注意防止和纠正脱离和超越初级阶段的实际。我们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正确地把握好社会主义文化的共性与在初级阶段表现的特殊性的联系与区别,并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握好度和分寸,才能避免片面性,扎实有效地推进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此外,认识把握我国现阶段文化的特质,还应正确认识文化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

任何国家、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只存在某种纯粹的、单一的文化,而必然是多元文化的并存。同时又都需要形成、并在全社会确立起主流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不可避免还带有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痕迹和影响。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并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由于观念形态文化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所以同旧的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相联系的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道德观等还会在社会上长期存在;而同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发展完善。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仍较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上将长期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社会上也还存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等等。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社会成员在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多样化,使初级阶段的思想文化呈现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结构特征。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会长期存在。

面对这种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格

局,我们在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必须承认、正视文化多元的现实。不能离开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的客观条件去片面追求和推行某种纯之又纯的思想文化,更不能重蹈过去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覆辙,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强求思想、文化的一律。而应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态度去坦然对待。同时又必须坚持文化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建设和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并通过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去影响引导各种非主流文化,力求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有机统一,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有序发展。

五、应该是适应并引导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千方百计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市场经济则是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最佳选择。因此,吸取世界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要适应经济基础,为经济建设服务,当然不能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更不能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必须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引导、促进市场经济健

康发展。这就需要正确认识把握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在全社会倡导、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文精神、经济伦理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道德规范,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在发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上,人们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市场经济通行的是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等,它同以集体主义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不仅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从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且也大大推动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变革和进步。在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运行机制中,可以孕育和催生许多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原则,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的生长点。

比如,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竞争经济,它只承认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而不承认任何超经济的特权,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这就有利于激发人们的自立自强意识、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不断进取精神,有利于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贵贱尊卑观念。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和机制,还在客观上要求并促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靠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取胜,从而促进诚实守信、质量第一、顾客至上、文明服务等职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使生产的商品符合社会的需求,能够在市场交换中实现其价值,这就

要求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提供商品服务者必须考虑他人和社会的需求,把利己与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它要求打破地区隔绝和国家封闭,发展经济交往,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这就有利于破除自给自足、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有利于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它的发展有利于培育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重视人才、重视科技和信息的观念。市场经济还是一种法制经济,它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从而促使人们形成和增强权利、责任、义务观念和民主法制的思想意识。现代市场经济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围绕着商品生产和交换而联结成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个人越来越离不开群体,离不开社会,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形成列宁所倡导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普及,等等。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和道德原则既是市场经济自身所蕴涵,也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而且从根本上讲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精神是相近、相通的,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所要倡导、培育和发展的文化精神。

当然,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有其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如果不能正确地加以引导规范,必然给我国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带来负面作用和不良影响。譬如,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从本性上说易于诱发“私欲”、“物欲”的恶性膨胀,如果与社会的法制和管理不健全、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等因素相结合,就会引发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损人利己行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的利益是相对独立的,商品交

换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并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基本的行为动机,如不加以引导约束,就会产生利己主义、本位主义,诱发“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甚至诱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去谋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一旦被扭曲变形,不适当地运用于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就会使部分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观出现功利化的倾向,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实践和逐步完善的较长过程。目前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交织,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另一方面,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和思想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等,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因而在这一阶段里,难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在思想道德领域出现某些混乱和失范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消极腐败的现象。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和问题,并非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带来的。其中,有些确实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所诱发,有些从表面上看似乎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运作义理有联系,但实质上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市场机制还未能正常有效地发生作用的结果。所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成熟和机制健全并充分发挥作用,其对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将会逐步较为充分显示出来,而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消极影响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克服。

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努力培育形成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人文精神、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抑制市场经济容易诱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思想观念,努力遏制和减少市场经济的消极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服务。

关于我国现阶段所需要弘扬的社会主义现代人文精神,笔者有另文阐述。这里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作一探讨。

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经济秩序的建立,需要从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发挥伦理道德作用两个方面对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进行外律和内律。法规制度从外部强制人们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秩序。经济伦理精神和道德观念,则可以内化为指导、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内律力量,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为其服务,引导规范其健康有序发展。这种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经济伦理,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发展要求,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要求;既要尊重和关心个人的正当利益,又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强调三者利益的统一;要求社会成员既要树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又要树立社会整体观念、履行社会义务和承担社会

责任;既要勇于竞争、追求效率,又要注重协作、兼顾公平;既要肯定和允许追求功利,更要强调手段的合法、正当和道德;等等。其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勤劳节俭,艰苦创业;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共生共荣;注重契约,诚实守信;履行责任,忠于职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注重质量,尽善服务;守法经营,依章纳税;保护环境,珍惜资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正当求利,义利统一;等等。

此外,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还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风尚和舆论氛围,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道德保障。

六、应该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

现代化是通过科学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完成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实现人类走向自身解放的历史过程。

作为人类解放的进程,现代化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变革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方式由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走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社会经济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大工业经济、进而走向知识经济;社会制度由传统社会的专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法制政治;社会成员由传统的、孤立的、片面的个人转变为全面社会化的社会人。换言之,现代化就是经济和社会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理性化(科学化)、社会化、民主化、知识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是实现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主题——现代化的一种制度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不仅决定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于现代化的历史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它既是现代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现代化变迁发生和推进的重要前提;它的发展必须要与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和任务相适应:

这种文化必须高度关注经济,重视发展,体现社会生产力第一的思想。特别是在大力发展工业文明阶段,必须树立和适度强化商品货币意识、财富意识,形成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精神文化动力。

这种文化必须重视经济法权、商业信誉和竞争效率,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有效的健康的运行创造理性的文化环境。

这种文化必须高度关注科学,重视知识,发展理性,体现科学理性精神,使之成为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这种文化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命运,重视启迪人的智慧、发展人的才能、发挥人的作用、实现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精神,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每个社会成员才能的充分发挥。

这种文化必须重视发展人的自觉的社会意识,体现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契约精神,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人作为社会人的健全人格和健全的社会意识的成长。

这种文化必须尊重和发展每一社会成员的平等、自主、公正的社会权利和政

治权利,促进民主、法制建设,体现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民主、法制精神,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不言而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是跨越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大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也必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处于变化、发展、成长中。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变迁推动着文化的变革和发展,而文化的变革发展又引导、促进和保障现代化的顺利前行。

在当前,随着经济上跳跃式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人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成为我国现代化高速前行的突出的制约因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大力度迅速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这是初级阶段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任务和压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自觉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规律,同时结合本国的国情,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促进整个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本文所探讨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95年第二版,第276页。

④本文这里使用的“人民大众的文化”的概念,是指文化的人民性。它与某些字面上相同相近的概念虽有联系,但不等同。比如:民族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或“通俗文化”概念,主要是指市井文化、平民文化;当代西方文化批判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所使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概念,指的是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其文化的创造目的和创造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是一种标准化、复制化、大批量的生产,追求消费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文化现象。

⑤《沫若文集》第13卷,第224-225页。

⑥《孟子·尽心下》。

⑦《老子》第四十九章。

⑧《老子》第五十七章。

⑨《墨子·节用中》。

⑩《墨子·尚贤上》。

⑪《墨子·尚贤上》。

⑫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第1版。

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页。

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责任编辑:童 轩

要素——结构——功能

——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之八

□ 坚 毅

(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江西 南昌 330077)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 范畴 要素 结构 功能

[摘 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原有五对,必须扩充为五组,此外还应该增添四组新范畴,要素——结构——功能就是其中之一。要素是前提、基础,结构是关键、核心,功能是作用、功效、能力,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立体化的。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18-04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只讲了五对: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立体思维”,尔后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体化”为题的学术讲座中,谈到“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时,除了把上述五对范畴改造和扩充为五组范畴之外,还特别增添了这样四组范畴:个别——特殊——一般;对立——选择——互补;运化——控制——反馈;要素——结构——功能。本文对“要素——结构——功能”这组范畴再作进一步阐述,以便引起学术争鸣。

“要素”,《辞海》的解释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在哲学史上,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创立经验批判主义,该哲学派别有一个很重要的术语,那就是“要素”。他认为,“要素”是宇宙中唯一的实在,它既非物质的又非心灵的,而是所谓

“中立”的东西;又说“要素”是感觉经验。为此,列宁严厉地批判了马赫主义。过去,我们为了要同马赫主义划清界线,所以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中就不敢直接讲“要素”,而只是在“内容”中提到它,所谓内容是内在要素的总和。现在,情况不同了,“要素”一词被广泛地使用着。

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是不固定的,它将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加。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是“三要素说”。马克思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也有“两要素说”,即人的要素——劳动者和物的要素——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斯大林就是这种观点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其要素也在不断地增加。现代生产力,除了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外,又有连结性要素,如分工、协作、管理,特别是还有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马克思说过:

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②邓小平认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③科学技术应渗透到其他诸要素中去，因此具有乘法效应。龚育之同志就认为：生产力 = 科学技术 × (劳动者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象)。

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是固有的，由于人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因此反映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的学说也就在不断地深化。各种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的。1897年汤姆生发现电子，1905年爱因斯坦发现光子，1919年卢琴福发现质子，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来人们又发现介子、超子、反质子、反中子等基本粒子。到目前已发现的基本粒子有300多种。1964年盖尔曼认为，所有强子都是由三种带有分数电荷的夸克(层子)粒子——上夸克(u)、下夸克(d)、奇夸克(s)所构成的。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创立，极大地提高了“要素”概念的地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要回避或降低“要素”概念的地位，理应把它提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结构”，《辞海》的解释是各个部分的配合或组织。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事物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构成关系。用贝塔朗非的话说，结构是要素的秩序。它具有稳定性、整体性、有序性。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结构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视不够的。在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论述中，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囿于“两分法”而把结构归于形式。毋庸置疑，“结构”也确实具有形式特征，但决不能因此就把它归于形式。众所周知，某个事物可能具有多种特征，但人们总不

能否定它是某个事物，而仅仅根据它有这个或那个特征就把它归于这个或那个事物。我们应当把结构从形式中独立出来，上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要降低结构的地位和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为了反对结构主义的需要。结构主义是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到本世纪60年代成为一种哲学思潮。它的核心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理论中。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用结构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歪曲，例如，用多元决定论代替马克思主义一元决定论。对于结构主义，我们是要反对的，但也不能全盘否定。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主张认识的对象不是事物的现象，而是事物的内在结构，应该把认识的对象看成一种整体的结构；强调整体大于部分，认为社会与人的关系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说明同时性的观察比历时性的观察更重要。所有这些方法论原则，我们怎么能全盘否定呢？！既然我们反对结构主义，也不能否定它的一切，那就更加不应该为了反对结构主义的需要，而去降低结构的地位，硬是要把结构归于形式。

其实，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即结构组合上有所不同，那事物的性质就会不同。例如，石墨和金刚石，它们的分子都是由相同数量的碳原子组成的，如果碳原子以平面状结合就是石墨，如果碳原子以立体状结合则是金刚石。石墨呈黑色，硬度为1，比重2.25；金刚石无色透明，硬度为10，比重3.51。又如，人数和素质相同的劳动力，由于组织和安排不同，所引起的生产结果会出现质的差

异。如果是良性结构,那整体必然大于各个部分之和;如果是中等结构,那整体只能等于各个部分之和;如果是差劣结构,那整体必然小于各个部分之和。既然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所以就应该把它提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结构,过去只在文艺作品中和自然科学中会提到,现在不同了,在社会科学中、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大谈结构的发展趋势:例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又如,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阶层结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再如,知识结构、文化结构、教育结构、伦理结构、年龄结构;还有,量态结构、质态结构、层次结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等等。“结构”一词的社会使用频率是很高的,而且会越来越高。对此,我们的哲学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发展的趋势,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中,进一步确立结构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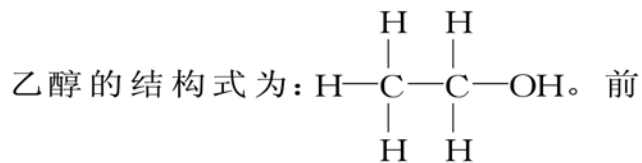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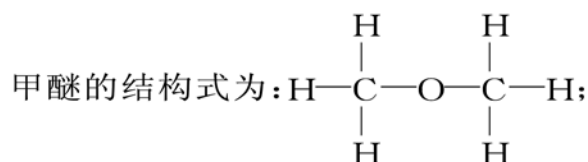
“功能”,《辞海》的解释是功效、能力、作用。系统论认为,功能是一系统对他系统发生关系时做功的能力。哲学上的解释应该是诸因素经过结构组合之后与环境相互联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属性、能力和作用。它包括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各种功能,生物的各种机能,社会的职能、效能、智能等等。属性、功能、作用既有质上的不同,又有量上的差别,存在着大中小、好中差、软中硬、正中负等种种不同情况。例如,氢易燃、氧助燃,由二氢一氧结构组合成的水却不易燃,也不助燃,反而能用来灭火。又如,石墨有滑感,能导电,化学性质不活泼,用作铅笔的原料,化工设备和机器的润滑剂,金刚石则很硬,一般用作高级研磨切割材料,划玻璃的金刚钻就装有金刚石。再如,

在社会生活中,既有“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个诸葛亮”的情况,也有“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问题在于三人之间的关系即结构组合得好坏。

要素——结构——功能的关系是辩证的。要素是前提,也可以说是基础,结构是关键,或者说核心,功能是作用,或功效,或能力。

组成要素有缺陷,尽管结构尚好,但功能也会有差别。三国时的刘备,在前期,虽然“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但仍无立足之地,只是在有了军师诸葛亮之后才如鱼得水,三分天下有其一”。

组成要素虽然相同,但数量比例有所不同,其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结构不同,其功能肯定大不一样。例如,甲醚和乙醇,组成要素都是碳、氢、氧三元素,数量比例也一样:2:6:1,但由于这些原子之间的排列顺序不同,就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化合物,在功能上差异很大。



前者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后者是液体,能够溶于水。又如,田忌与齐威王赛马,各自都是上中下三匹马,但前者的上中下三匹马都分别弱于后者的上中下三匹马。如果是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那田忌必输无疑,但他用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结果一输两赢取得胜利。

要素是结构的前提,要求最佳,但要注意数量比例,特别是必要性,也并非越多越好。要素通过结构会影响到功能。结构是核心,不仅决定功能,而且会对要

素提出要求。功能是结构的表现,由结构决定,但也会促使结构变化,并影响要素质量。要素、结构、功能形成鼎立统一关系。

要素——结构——功能这组范畴同样具有普遍性。在自然界,不论是非生命世界的物体,还是生命世界的物体,都是由要素组成的,都是有其内部结构的,都是具有性质、机能、功效、能力和作用的。在社会领域,家庭、工厂、商店、公司、学校、团体、党派、国家等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们都有自己的组成要素,都有内在的组织结构,都有特殊的社会职能。在意识形式领域,文字、语言、逻辑、知识、科技等都有其自身的要素、结构、功能。可见,要素——结构——功能理应成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要素——结构——功能这组范畴的确立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是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使我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去认识世界、分析事物、解决问题时更加卓有成效。第二是把要素上升为基本范畴,就可以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角度)来重视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学校教育的实施,各类人才

的培养,领导班子的配备,物质生产的进行等等都需要重视要素。第三是把结构从形式中分离出来上升为基本范畴,就可以使我们更加重视结构,使用结构分析法,并在优化结构上大做文章。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优化结构的工作。第四是把功能上升为基本范畴,就可以使我们十分注重事物的功效、能力和作用,彻底克服过去存在着的种种错误言行,例如:“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只要路线正确,颗粒无收也是好的。”“干与不干是态度问题,只要干起来就行。”“只要动机正确,效果不好可以原谅。”……第五是跟上了时代的前进步伐,总结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补充、丰富和发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责任编辑:冯生

可贵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评介

□ 贾春峰

(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员、教授,北京 10000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22-02

张江明的论著《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一书,不久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5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下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及其应用。这部论著,集中反映了近些年来作者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发展和对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新的伟大振兴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通观这部论著,我为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或优点:

一是指导思想明确。对中国现实改革与建设实践的分析 and 研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由于作者的深厚的哲学造诣,所以分析问题,处处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文中的论述,并不是

把哲学原理简单加以套用,而是把哲学原理、哲学方法论渗透、作用于、体现于实际生活的分析中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因而这就具有了科学理论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和深刻的说服力。

二是论述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作者特别强调要用科学态度研究邓小平理论。正是从科学研究的高度,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哲学、邓小平理论与人的哲学、邓小平理论与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与精神文明和爱国主义、邓小平理论与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邓小平理论与文化、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及其重大贡献等重大问题,作者都作出了有理有据、有理论深度、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分析论述。其中许多篇章还作了历史和现实、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更是给人以重

要启迪。

三是突出实践性,注重倾听实践的呼声。特别是对在中国目前情势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建设精神文明、如何建设特区、如何看待广东的发展比较快等问题,作者的论述并不是只作出抽象议论,并不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推理,而是坚持从发展变化、生气勃勃的生活实际出发,从生活中引出道理。列宁说过,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正是遵循了这一科学教导,才使这部著作的论述,具有了鲜明的实践性特色。

四是论述的深刻性及新的研究视角。作者对于社会生活与人的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思考的分析,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邓小平理论与文化”中,作者论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发展,论述了全面认识现代经济文化的作用及其辩证关系,论述了以邓小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发展现代经济文化的问题,特别是提出:“经济文化: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这都表明了作者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视角。记得

几年前(1994年12月)在广州,由广州市社科院等单位联合召开过一个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研讨会,张江明教授在会上作过一个系统发言。当时我同中共中央编译局参加会议的李珠泗同志谈过,作为理论界的一位老同志,江明同志对理论前沿问题认真研究和不懈追求,实在令人钦佩。江明同志这篇认真准备的发言,后来刊登在由李珠泗同志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引起了读者的好评。

张江明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工作时,曾有过工作接触。当时他那谦虚为人、刻苦治学的良好作风,给理论局的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些年,每当我去广州,都会见面就学术研究交换些看法。他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不断作出新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值此这本新著出版之际,我表示衷心祝贺,并且祝愿江明同志以自己多年从事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和积累起来的聪明才智,为我国的理论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冯 生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综合思考

□ 潘保华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广东 深圳 518000)

[关键词] 国企改革 问题 发展思考

[摘要]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是当前经济理论亟需突破的难题。文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作了简要回顾,描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些思路。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24-05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不同时期采取的各项重要举措都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

(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目标的改革。1978年至198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着眼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这对于在计划经济束缚下的国有企业确实注入了一些活力,但由于缺乏产权约束和外部竞争压力,企业得益大小主要不在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而在于计划经济形成的行业或价格上的优势,因而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便随着时间推移而快速递减。

(二)规范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1983年至198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是利改税和拨改贷。在利改税上,一方面用高税率来限制高税高利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为保证财政收入,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税收

的形式固定下来,即对高盈利企业征收55%所得税,盈利较少的企业按不同情况实行8级超额累进计税;在拨改贷上,改变企业资金来源渠道,使企业资金的无偿使用转为有偿使用。利改税和拨改贷将企业上缴利润的义务由“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使企业与国家之间从“自家人”关系变成所有者、债权人与经营者、债务人关系,对确立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分配关系的法理依据不充分,对企业而言,导致“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问题日趋突出,实行利改税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连续22个月滑坡(当然这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对国家而言,由于银行体制和机制未能及时转换,拨改贷也给后来发生的金融风险埋下了隐患。

(三)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1987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举措主要是推行承包制。为解决利改税之后带来

的价税关系、税利关系上的混乱和由此产生的企业竞争不公平问题,进一步硬化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配关系,更有效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1987年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基本原则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制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扭转当时企业效益下降趋势、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和提高职工收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承包制的内在缺陷显而易见,突出的有几点: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长期合理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行为短期化;三是包盈不包亏成为普遍现象;四是无法适应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态过程。

(四)确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1993年以来,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确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界定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标志着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即在改革的思路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表明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要解决生产效益问题,更重要的是重新确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地位,重新确定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使其成为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改革的主要形式有: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构建国有资本三个层次管理模式,把国有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阶段的改革思路清晰、成效显著,但仍有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难于解决。

二、国有企业改革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滑坡,亏损问题依然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年报,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

企业亏损额为1023亿元,比上年度多亏21.9%。深圳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相对较少,但经济效益也有一定程度的滑坡。1999年1至2月份,全市384家国有控股企业中,有138家亏损,亏损面达36%,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是深圳最早建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控股的24家一级企业中有10家亏损。

二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据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情况调查,1997年13个行业的2592个亏损大中型国有企业里,总资产3130亿元,净资产仅360亿元,亏损额194亿元,其中有869家企业资不抵债共184亿元。预计3年内将资不抵债的有727家,3至5年将资不抵债的有261家,5至10年内资不抵债的有261家,10年后将资不抵债的有393家。这些企业资产流失的直接渠道主要是亏损和少提甚至不提折旧费。近年来,在企业改制和重组中,一些企业兼并、破产、转让等做法不规范,又增添了一些资产流失和逃避银行债务的渠道。

三是企业不良资产严重、债务沉重,一些陷入危机的企业找不到出路。企业不良资产的突出表现是把产品积压、库存、应收账款长期沉淀下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资金无法保证;盲目新建、扩建的项目不能产生效益,成为背不起又甩不掉的“烂项目”;盲目举债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一些企业濒临破产,但由于涉及连环债务、人员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而难于实现破产,扭亏解困无望,包袱越背越重。

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原因十分复杂。既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原因;既有历史积累的原因,也有现实情况变化带来的原因;既有改革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管理和技术上

的原因。总的来说,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许多企业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来的,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新的不适应,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必然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从体制上看,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不分的问题十分突出。以粮食流通部门为例,由于政企不分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表明,全国动用了约3万个单位5万人基本查明了粮食流通部门资产流失情况,全国共亏空2100亿元,亏空的主要渠道是被挤占、贪污和私分,几乎每个省市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看,多年来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低水平的粗放型扩张,造成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大量设备闲置,产品积压。从企业内部的体制来看,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企业发展的历史因素来看,传统产业的设备落后、技术落后、工艺落后、产品落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债务过重、冗员过多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从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来看,市场秩序不规范,假冒伪劣盛行,边境走私猖獗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企业的生存。

三、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原则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概括。由此出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实现公有制为主体提供必要保证。同时要大力推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能够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

要求。这是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原则。

另一个问题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体现呢?是不是要以国有制主体来体现呢?显然不是。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含义及其主体地位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要努力寻找能够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大胆利用一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基于此,笔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有特殊的产权关系和资产管理方式,甚至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经营目标,它在各类型的企业中,管理成本是最高的,国内外企业无一例外。因此,国有企业应当从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逐步让位。这种让位并不是要国有资本从中退出,而是在这些行业中,如果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就应当主动让位。有些国有独资企业可以转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有些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可以转为相对控股,有些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可以转向不控股只参股。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退出而国有资本不退出,这样,既有利于国有企业改变其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又能保证国有资本的力量不会削弱,从而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

(二)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理顺产权关系、政企关系

无论是历史原因还是现实需要,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仍然会在各类经济形式中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在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业里,国有企业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的制度创新,使之适应市

场经济的要求。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改善企业产权结构,形成合理的所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权责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关键是通过市场手段,调整各类投资人的持股比例。除特殊行业外,谁能在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应由市场来决定,国有控股公司无论上市与否,都应给现有的国有股权开辟流通渠道,以改善由于国有股本比例过大而不能流通,导致其他股东的决策权形同虚设的状况。

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理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责关系是获得生机的关键。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享有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具有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市场公正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与作为部分企业产权所有者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政企不分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这两种不同职能的区别,因而常常出现政府职能“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企业取得法人财产权,则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然也不得损害所有者的权益。

产权制度改革必然引发分配制度改革。投资收益在个人收入方面所占的比重,将随着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国有企业要根据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重新调整内部分配关系,在投资人的监督制约下,强化成本核算,同时必然会加强对劳动力成本的控制。企业必须限制管理人员的过高收入,改变低效益状态下的高工资高福利,以确保投资人的权益,形成企业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通过改制、改组和改造,提高企业资产质量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带来巨大的不良后果,由此造成国有企业大量的不良资产使国民经济潜伏着巨大的内在风险。集中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以资本为纽带,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然,这种重新组合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拉郎配”。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立足点在于搞活,以什么形式放开,应以有利于搞活为标志。对于扭亏无望的企业,要果断地让其“脱胎换骨”,宁可的保障体系将职工养起来,把理不清的债务挂起来,也不能让这类企业长期亏损、资产不停地流失下去。

(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改革与管理孰重孰轻?一直是经济学界有争论的问题。尽管人们大多从深化改革的层面来研究国有企业的出路问题,但是,许多企业衰败由管理不善造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深化改革与加强管理必须并重。在体制不完善、经营环境不好的情况下,管理水平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管理的头等大事是突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科学地界定董事会、经营班子和党委会的权责特别重要。董事会作为决策班子,对企业重大人事任免、重大投资决策通过集体研究作出决策,这里特别要防止董事长个人说了算,因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个人不是企业的最大股东,不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他是受政府委托行使大股东权利的,其自身利

益与所有者的利益关系并不直接,因此在重大决策问题,需要更广泛地尊重各方面的意见。厂长经理作为经营班子,具体实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有许多具体的决策行为,尤其要保证权利和责任一致性。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存在经营班子“零风险”的机制,是造成企业诸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一现状必须迅速改变。党委会的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是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思想情操带动企业的发展,而不是运用某种权力来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其次是实现企业经理人员角色的彻底转换,推动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企业管理人员的政府官员角色向企业家角色的转变,加快经理人才市场建设,建立科学的经理人才的培养机制、评估机制、选任机制,推动企业家的职业化、市场化进程。第三个方面的重要课题是建立高效的投资决策体制、财务监控体制、经理人行为激励和约束体制。尤其在企业监控体制方面,必须建立企业经营活动的预警系统,其作用相当于航海舰艇上的安全监控系统,密切注视大舰航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因素,及时发布航向信号,避免发生航行事故。企业的这种监控必须是事前而不是事后。

(五)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

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从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现行体制出发,把企业培育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掌握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客观要求,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生产经营者的素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以新工艺、新产品、新价格创造新需求,开辟新市场。

在社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特殊时期,国有企业要踩准节拍,尽快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自身的资产质量和技术素质。随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效应不断实现,我国短缺经济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但是相当多的企业还没有把过去的经营思路调整过来,以致买方市场一旦形成便显得束手无策。有的企业,职工数千人,行政人员数百人,居然没有一个开拓市场的营销机构,这样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持续生存。现在,我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大部分商品处于饱和状态,一些行业已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企业坐等消费市场启动是没有出路的,积极的办法应当是主动创造新的需求,适应市场消费热点转换的变化,增强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以适销对路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六)为国有企业营造公平、宽松的经营环境

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方面,强化政府调控职能是关键。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在强调投资拉动的特殊时期,更要严防低水平的重复扩张;二是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开辟更广泛的渠道促进资本的流动,打破行业垄断;三是加强和改善司法、执法和执法监督,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公平竞争;四是继续严厉打击走私,保护民族工业的正常生存;五是对历史形成的特殊问题作出特殊处理,实行适度的扶持政策,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度过转型时期的难关;六是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改革与发展环境。●

责任编辑:谭湛明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经济安全问题研究

□ 狄荫清 郑 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 北京 100836)

[关键词] 中国 加入世贸 经济安全 探讨

[摘 要] 本文认为, 入关对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说, 意味着部分地放弃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使民族工业暴露于跨国公司的直接威胁之下, 因此我国应谨慎审视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由于入关后扩大开放国内市场, 中国很可能难以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进一步加深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 导致国有企业无法收回大量产业投资, 银行的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 失业率继续上升, 财政压力增大, 就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出现短缺, 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消化, 从而使社会的不稳定形势发展, 因此, 应该考虑实施自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把培育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的成长, 解决紧迫的经济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 作为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优先大事。中国应借鉴美、德、日等国长期实行高度关税保护扶植民族工业, 最终成长为世界市场竞争强者的成功经验。中国应在有效的保护中逐渐加大开放力度, 促使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成长壮大, 奠定中国真正的独立的、强大的坚实经济基础。

(中图分类号) F7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29-07

一、谨慎审视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如果说, 从长远来看是否入关值得认真考虑的话, 那么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呢?

如果两年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 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 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 出口额蒸蒸日上, 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 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 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 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 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

但是今天, 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 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 而且从 1999 年 1 月份的统计数据看, 损失的程度还将继续加大。虽然出口下降的相当大部分是因为全球需求萎缩, 但不可否认, 这里也包含着出口份额下降的因素。如果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 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 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 入关对解除美国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 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较

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入关的弊端却会同时在几方面上升。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就业和财政金融稳定的大事。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如果考虑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8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

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同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1993年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地总结80年代开放和保护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忽视了适当保护与计划的重要性,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于是,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80年代国有企业10年亏损的许多倍,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80年代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90年代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于是,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国有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和偿还银行贷款,以前用于引进、改造设备的上万亿贷款,随时可能转化为触发银行体

系危机的呆、坏帐,各类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也会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90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沉重的代价尚历历在目,倘若我们又急着入关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境况势必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成为经济运行中随时可以爆炸的隐患。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的就业主渠道,维系着数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作为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甚至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

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还特别以引进跨国公司为自豪,一方面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

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有大量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我国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却因众多行业的效益普遍不佳找不到投资出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迟早转化为银行亏损和坏帐,而且社会储蓄与产业投资之间失去平衡,必然引起导致乘数般扩大的连锁反应,加深当前的社会失业和生产过剩困难,当前,银行体系的数万亿资金需要可靠的投资机会,上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每年至少10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倘若没有类似80年代那样众多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那么,这些本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包括大量的闲置资金、工厂设备和劳动力,反而会成为触发经济危机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更有甚者,如果不能将银行体系所吸纳数万亿资金转化为投资,却将投资机会让给外国过剩资本,让外资携其强大的技术优势来占领中国市场,那么不但现有的银行呆坏帐很难消化,而且大量存款也将成为拖累银行的负担:贷款无法放出,而利息却还得继续支付,从而加重银行体系的风险。倘若上述状况无法获得纠正,国内剩余资金无法与剩余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国民经济将丧失持续均衡发展的机遇,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严重危机。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则是关系到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呢?

一位外经贸部的有关人士说,我们虽然没有入关,但已经在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一步步地减少关税,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在他看来,按入关的要求减少保护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可能只对某些部门是好事,对于中国发展的全局则未必。我们应把降低关税、扩大引

资与内需不振联系起来,与民族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正确认识“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而不应就入关谈入关,就国企谈国企,甚至以入关来解决国企困境,这无疑加重国企解困的难度。如果还没有入关,问题就这么严重的话,入了关就更不容易解决了。好在无论是降低关税,还是取消限制,主动权仍操在中国政府手里,问题还不大,无非是再作一些调整。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虽然主管对外贸易投资,但始终以保护和振兴日本工业为首要任务,其扶植日本产业的强大作用令西方人生畏。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考虑更多地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加强外经贸部同工业部门的协调,成立负责保护民族工业的跨部门高层机构。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大危机的征兆,倘若我国入关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必然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大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当年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5%,其遭受萧条打击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防范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这也是我国应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入关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入关问题上所面临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国际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反而大幅度下降,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体

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两国的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威胁美国工人接受更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美国工厂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国工厂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形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40%多。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民族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80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金融危机,1998年墨西哥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那么不难发现,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因入关而强大起来的,相反,却往往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二、关键是要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从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出发,入关重要的是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美国的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们都非常懂得美国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懂得怎样在长远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增进眼前利益,他们始终把美国经济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防范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为此甚至不惜威胁、制裁

盟国,放弃大笔的出口收入。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越是联系密切,就越应该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我们在1997年以前就已经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即使我们的外汇储备再多一些,也很难敌得过国际金融炒家的联手袭击,难免不落入金融危机的陷阱。实际上,旧中国曾有100年融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历史,有门类齐全的商品、证券、外汇、黄金市场,也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外国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曾经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由于不能掌握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常常是不但没受国际经济交往之利,反而受国际联系紧密之害。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利用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向中国进行倾销。1946年中国沿海22个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这充分说明,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

在1992年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热潮中,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未能辩证地正确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体现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开放原则”,是开放和保护相结合的成功。而近年来出现的盲目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倾向,其实不是发扬而是抛弃了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违反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原则。倘若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利益缺乏认真思考,未经充分的实践检验或改革试点,而依据主观意志或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行事,就可能给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造

成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促使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作更冷静的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凡是事关重大的改革政策措施,不能单纯依据理论分析或领导意志,而必须经过改革试点的实践检验,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正是因为我国采取了谨慎求实的态度,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经济改革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论证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很大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孙子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告诫不应在缺乏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进行事关生死的战争冒险,善战者应先求不败而后求胜。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扩大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权,还是开办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都采取了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的谨慎办法。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其潜在的风险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不仅涉及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类企业,而且事关广大人民就业和社会稳定,一旦出现失误可能无法自己纠正,甚至危及社会基本制度和国家主权。对于这样事关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们必须采取了更为谨慎求实的态度,应该考虑先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通过改革试点进行长期的试验摸索,检验入关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出口导向战略渐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出口导向战略还有两个亚种,即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笼统地说,美、日、德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基本上是采取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美、东南亚、非

洲,以及入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是以民族工业为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工业品占领世界市场。美国实施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至今美国的进出口额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但无论其进口或出口都对世界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则主要依靠外商投资,把出口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以出售附加价值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前者依靠民族资本,有独立发展的主动权,它首先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既不急于引进外资,又不急于扩大出口,而着重通过国内竞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然后再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则主要依靠外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拉动一时的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了扩大出口不惜出让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机会,成为外国的加工车间和产品倾销地,以丧失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短期利益。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出口势必难以为继,因为外资企业随时都会迁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那时,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将只换得一片经济废墟,留下一堆贬值的货币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重负。这不仅是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组织,沦为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分工体系中的经济附庸,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牺牲品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奉行的本来是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在80年代,一方面内需旺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但是以1992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为标志,各地出现了盲目的开放区热和引进外资热,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逐渐受到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诱惑和侵蚀。很多地方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引进外资,只图本地方的一时增长,很少

考虑外资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这就形成了大规模与四小虎争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局面。这一方面加快了东南亚外贸形势的恶化,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面临同样的风险:国内市场中高档市场受到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挤压,企业赢利性不断下降,内需萎靡不振,从而迫使我们进一步把全部赌注都压在廉价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上,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

这就把我们逼入了一个两难选择,或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采取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依靠振兴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扩大出口;或者人民币贬值,不由自主地加入竞相贬值的依附型出口导向国家的行列,为了增强向西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迫放弃和出让更多的贸易利益。但是,无论从稳定大局出发,还是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人民币贬值都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全球金融隐患重重的情况下,人民币还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如果加入由强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被迫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内放弃对国内工业的保护的话,那么入关就意味着只能选择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

应该说,中国只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如果中国也像东南亚小国一样靠廉价劳动力挤入世界市场,则必然会极大地恶化廉价商品市场的竞争形势,不但把这些小国逼垮,自己也会落入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中。相反,如果中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则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全可以作为国内企业逐渐强大起来的坚强后盾,这是日本列岛发展过程中所不曾有的优势。采取这一战略,诸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如国有企业的解困,内需的扩大,工人的就业,产业升级换代,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而最终则是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

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

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就是实施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性所在。不妨设想,这一战略可以具体化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采取充分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大关税、非关税壁垒的自觉性和力度,在跨国公司时代则要适度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周密地策划国内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扶植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

这里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如何认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我们认为,在打击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意义上,不受限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其中又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威胁则更难以对付,倘若任其不受限制地占领有限的国内市场,就成了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它们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即使是中国的大中型企业也显得势单力弱。

因此,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的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 1992 年以来盲目竞争引进外资的教训,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

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它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

进一步讲,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我国应考虑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重,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实行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倡导“有保护的渐进开放”,在入关前做好充分维护我国长远利益准备。●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

□ 符正平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在职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竞争优势 价值链 波特菱形 企业群落

[摘要] 本文对波特竞争优势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背景分析, 然后重点介绍了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在 90 年代的新发展——企业群落理论。文章最后分析了波特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与意义。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36-04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从 80 年代起陆续发表了其著名的三部曲, 即《竞争战略》(1980 年)、《竞争优势》(1985 年)、《国家竞争优势》(1990 年), 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竞争优势理论。本文首先从学术、时代背景上对波特的理论进行分析, 然后介绍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在 90 年代的最新发展, 并分析其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竞争优势理论的学术与时代背景

哈佛大学商学院拥有一批著名的企业管理方面的学者。如企业史学家钱德勒, 撰写过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管理革命》(1977 年); 跨国公司专家凯夫斯, 撰写过《跨国公司与经济分析》(1982 年)。哈佛商学院集中研究的是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其学术风格属于管理学的风格, 管理学本质上是综合性的。与经济学家强调市场价

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同, 这些管理学家更重视的是企业中的管理和战略行为的作用。我们理解波特的理论, 也需要从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学术背景来着眼。波特的三部曲无疑是哈佛商学院学术传统的集中反映。

波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两个方面。因此, 在他的著作中, 单个的企业与产业始终是他一贯的研究对象。他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即竞争力的三种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竞争优势》中, 他创立了价值链理论, 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价值链的不同。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 波特把他的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 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我们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论, 即是指波特的菱形理论, 因为这个理论是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角度提出来的。从表面上看, 国家竞争

优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往往从一国的汇率、国际收支、要素禀赋来进行研究,而波特运用哈佛商学院的经典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从一国的各种产业的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入手来研究一国的宏观竞争力问题。

波特菱形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国在某个特定的产业上获得了长久国际竞争力?在当代国际贸易中,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明星产业上。如日本的消费电子业,意大利的毛纺、皮革制品、金融珠宝业,英国的保险业,荷兰的花卉业,德国的化工、汽车业,美国的广告、高新技术产业。波特认为,这要从当地企业所处的独特竞争环境来寻找答案。波特菱形理论(竞争力模型)包括四个方面因素:(1)要素条件。包括一国的天然禀赋与政府、企业投资创造的高级要素,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2)本国需求条件。包括本国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及需求的国际化;(3)相关支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4)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进入壁垒与组织管理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等。波特认为这四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由此产生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产业。

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80年代美国的一些传统支柱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其竞争力被日本和西欧国家所超过;在一些新兴产业也受到这些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当时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1983年,里根总统设立产业

竞争力委员会,波特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此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普遍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使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获取竞争优势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需求。波特的理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他的理论对9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克林顿总统在其上任伊始的1993年就宣称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帮助美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竞争取胜”。

二、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波特对他的竞争优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发展的方向是把他的菱形理论与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结合起来。他在最近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出了企业群落(Cluster)这一新概念,并把它称为“新竞争经济学”。

企业群落是指经营同一产业的在业务上有密切关联的一群公司和相关机构集聚在一个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企业群落是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一个共同特征。以美国为例,重要的企业群落有:微电子、生物技术、风险资本集聚在硅谷,汽车设备与零部件集聚在底特律,互惠基金、生物技术、软件与网络、风险资本集聚在波士顿,金融服务、广告、出版、多媒体集聚在纽约,飞机设备与设计、软件、金属加工集聚在西雅图,房地产开发商集聚在达拉斯,化工企业集聚在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娜两州南部交界处,影视娱乐业集聚在好莱坞。德国汽车业集聚在慕尼黑等南部地带,化工业集聚在法兰克福一带。荷兰的花卉业集聚在阿姆斯特丹与鹿特丹一带。瑞士三家最大的制药公司集聚在巴塞尔。英国的拍卖公司集聚在伦敦城的几个街区内。

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群落更是举世闻名。如佛罗伦萨市附近的普拉托市是著

名的毛纺厂商集聚区。该市面积不到 100 平方公里,人口仅 15 万人,但却拥有 14000 多家与毛纺业有关的中小企业。企业之间实行高度分工协作,每个企业只专门负责一道工序或一两种产品的生产,如纺纱、织布、印染、毛纺原料与产品运输、融资、原料与设备进口、成品出口以及相关的科研与咨询功能。该市的梳毛产品占意大利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70%,占同类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 50%。类似普拉托市的中小企业专业区在意大利共有 70 多处,每个专业区的产品独具特色,如座椅、大理石、陶瓷、珠宝首饰、皮革服装等,大多属于传统产业,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通常一个企业群落内,既有主导产业企业,又有为主导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其他产业企业和机构。从垂直关系来说,包括提供专业化投入的上游企业,如零部件、机械设备、产品服务,以及下游的分销渠道与顾客。从横向关系说,包括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或有相关技能、技术和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公司。此外,还包括政府和其他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研究与技术支持的机构,如大学、质量标准检测机构、思想库、短期培训机构及贸易协会。这些机构共同组成一支立体作战军团,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从而赢得企业与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生产企业群落为例,该企业群落包括有 680 家葡萄酒生产厂家以及几千家独立的葡萄种植者。为这二者提供配套服务的互补企业包括:葡萄存储、化肥生产、葡萄收割设备及灌溉技术企业,酿酒设备、酒桶、酒瓶、瓶盖及软木塞制造企业,标签、公共关系及广告、专业出版企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培养葡萄

酒专业人才,当地有专门的葡萄酒研究所,在加州地方议会还设立了专门的葡萄酒委员会。该企业群落与当地的农业、食品、酒店旅游企业群落也有联系。

波特对企业群落现象的解释,仍然是依据他的价值链学说与菱形理论。企业群落实质上是企业产品价值链在空间地理上的紧密结合,或者说波特菱形四要素在同一个区位的相互作用。企业群落现象在工业化时代就已出现,知识经济的来临使这一现象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企业群落属于一种网络化的组织,不同于一体化经营的科层组织。这种网络组织代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

企业群落这种新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外部经济效应。集聚区域内企业数量众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但集聚区内的企业彼此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生产率极高,产品不断出口到区域外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从而整个产业集聚区获得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2. 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空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合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企业集聚区内企业地理邻近,容易建立信誉机制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区内拥有专业化的人才库,还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工作,这就减少了在雇佣专业人才方面的交易成本。集聚区内有大量的专业信息,个人关系及种种社区联系网络使信息流动很快,这样减少了企业的信息成本。重要投入品大多可以从集聚区内其他企业就近获得,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还能享受供应商提供的辅助服务。因此,集聚区企业之间保持一种充满活力

和灵活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构成了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在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动态竞争环境里,这种安排相对于刚性化与缺乏弹性的垂直一体化安排、远距离企业战略联盟安排,更有效率。

3. 学习与创新效应。企业群集是培育企业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温床。企业彼此接近,会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peer pressure)。不甘人后的自尊需要,当地高级顾客的需求,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他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能够较快地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术。对于难以编码化和远距离传递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地理接近更为重要。这种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是企业群落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企业聚集也刺激了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新企业的不断诞生。

4. 品牌与广告效应。企业群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后,会在消费者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有时这种形象会涉及到一些相关互补性产品上,由此产生一个个优势产业群。

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给人的印象是经济活动将更加分散化,似乎地理区位选择在企业 and 产业竞争中的重要性将下降。企业群落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经济全球化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日益本地化,区域创新环境日趋重要。对企业和产业竞争优势非常关键的高级要素与创新活动,日益集中在发达国家。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重大挑战。

三、波特企业群落理论的几点启示

1. 企业群落是一种有效的空间竞争方式。我国的许多产业从全国来看,企业家数很多,按理竞争应该很激烈。但是,经营同一种产业的企业地理上是高度分散的,导致许多企业在当地事实上处于一种垄断地位。这种产业布局方式在空间上无疑大大减弱了竞争的强度,也容易使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人为造成垄断局面,导致我国“大而全”、“小而全”企业过多,企业之间分工程度低,造成所谓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2. 企业群落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大学与科研机构是群落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主动向大学投资,以获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大学通过当地企业服务以获取自身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大学和科研机构今后应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企业也应加强教育投资与知识投资意识。如目前在我国大学的奖学金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设立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主动到大学设立奖学金的很少。

3. 企业群落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责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大企业的发展,而是要营造一个适宜企业群落生存发展的区域创新环境。这需要政府向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高效率的法律体系、制定竞争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政府应从当地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出发对企业群落的形成起促进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别的地方的企业群落进行直接竞争。

4. 目前我国已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群落:一种是处于农村小城镇的乡镇企业群落,如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专业镇;一种是处于大中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内的企业群落。这两类群落的具体生长机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波特的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的一部力作

——卢泰宏《信息资源管理》评述

□张浩良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3)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 学术专著 评介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40-03

信息资源管理(IRM)是本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继而在欧洲,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的信息管理研究新领域。我国IRM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泰宏是我国最早开拓IRM研究的学者之一,卢教授与沙勇忠合作撰写,由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先生作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是我国真正把IRM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系统研究,富

有开拓性的学术专著。此书不仅正确地提出了IRM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与原理问题,而且从IRM的结构与内容上系统、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而建立起IRM学科的基础性框架和体系。

《信息资源管理》按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次:IRM基础,给出IRM的基本含义和概念;第二层次:IRM结构,描述IRM的技术、经济、人文三维结构;第三层次:IRM的分支及应用。

理论无疑具有借鉴意义。这两类企业群落的生长发育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前者代表了农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趋势,后者代表了经济的信息化、知识化过程。与波特所研究的西方发达国家情况不同,在我国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两类企业群落的发展关系,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著《竞争战略》,华夏出版

社,1997年。

2、迈克尔·波特著《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3、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Free Press, 1990.

4、Michael E.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 December 1998, P77 - 90.

5、杨祖功主编《西欧的中小企业》,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谭湛明

信息管理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对成熟的系统理论,在实践中又走过许多曲折之路,信息管理曾被怀疑是否是一门学科。但信息管理不顾“取消论”和“替代论”者的责难,始终在向前发展,终于走到 IRM 新阶段。因此,科学、准确地阐明 IRM 的成因,对于理解、把握 IRM 的概貌和本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作者详细考察信息管理的历史演进,分析了信息管理的核心问题从存储、处理、传递、查找到利用的更替,比较了信息管理发展阶段论的多种模型,特别是依据信息管理思想、目标与方式的不同,把信息管理划分为传统管理、技术管理和资源管理三个时期,这有助于读者充分领略产生 IRM 的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靠人力和手工劳动解决纸质文献资料的保存与处理问题,这就是信息的传统管理时期。到本世纪 50 年代,进入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技术管理时期,并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形成管理信息系统(MIS)的热潮。但从总体上说,MIS 未能达到原先的期望,许多系统归于失败,名声不那么好,一个形象的说法是“MIS 不如 Miss(管理信息系统不如秘书小姐)”。究其原因,主要不在技术方面,而在于计算机人员纯技术的、“见物不见人”的思想路线,同时把用户视为系统环境而不是系统组成部分,因而不能确切理解组织的信息需求,不能妥善处理信息系统与它为之服务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进入 80 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信息系统呈现分散化、网络化趋势,网上贸易与电子资金传送使信息活动产生更为复杂尖锐的矛盾,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信

息的战略应用对组织的效率与效益乃至命运越来越重要,管理者对信息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更高级的信息系统。纯技术的信息管理对此已力不从心,因而需要新的信息管理思想和新的信息构架,这就是 IRM。正如作者所指出的:“IRM 的诞生是信息管理实践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信息管理理论更新的必然要求”。研究 IRM 的目的,正是为了在 IRM 的框架与思路下,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解决信息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信息资源是(收集、存贮、加工、传递、检索、利用等)信息活动中各种要素(信息、技术、资金、设备、机构、人员、规程等)的总称,是一个复合概念。IRM 的基本含义是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对各种信息管理对象进行的综合的集约化管理,是三种基本信息管理模式,即信息的技术管理、信息的经济管理和信息的人文管理的集约化,三维集成是 IRM 的结构框架。

与 MIS 相比,IRM 的显著特征是:(1)确立信息作为经济资源、管理资源和商品的观念,强调从经济角度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2)信息管理不能单靠技术解决问题,还必须重视人文社会因素,强调将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结合起来协同解决问题;(3)强调完善、优化面向组织的、更有效地支持高层战略决策的信息管理,而不只是在操作级和管理级实施信息管理。

人类历史表明,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使人类社会进入到更文明的阶段。第 4 章“信息资源的技术管理”考察了信息技术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人们的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给信息管理带来的变革与冲击,进一步揭示 IRM 产生的技术背景,研究

怎样运用信息技术改进信息管理,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综合管理、危害管理、网络建设、新的信息系统和系统设计思想等。这对有效实施 IRM 是十分重要的。

从经济角度思考并实施信息管理学是 IRM 的强大推动力和极富生命力的发展方向。第 5 章“信息资源的经济管理”介绍西方信息经济学开创者的理论成果,主要是:(1)从宏观与应用角度,马克卢普和波拉特运用计量、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对信息经济规模和结构的研究;(2)从微观与理论角度,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和阿罗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对传统经济学诸命题的重新观察,研究信息现象在一般经济行为过程中的具体规律。作者在综述国际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息商品的成本价格,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生产、流通和分配中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利益等给出理论说明。

信息资源的人文管理是 IRM 区别于技术管理的重要特征,作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方法有独到之处,向读者展示了人文管理的丰富内容与崭新天地。作者首先引入“信息人”的概念,揭示人类共同的信息心理与信息行为的五个法则,即追求信息时的最小努力法则和适度满足法则,由期望或兴趣驱动信息行为的期望法则,信息的接受与人匹配的法则,以及许多信息行为的无意识法则;然后,探讨人的因素在信息管理中占有主导、核心地位的种种表现;最后,详细

阐述人文管理的三种手段,即信息法律、信息政策和信息伦理的各个方面。

《信息资源管理》的第三部分,在上述理论框架下,考察 IRM 实际应用的两大领域,即政府部门和公司的信息资源管理,以及作为 IRM 技术路线发展的主要趋向的网络管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书中别具一格地汇编了 17 个资源块,内容涉及国外 IRM 研究的核心作者,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指数,信息技术对主要行业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信息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以及中外信息法规等,为全书的理论阐述提供丰富生动的实例与背景支持,是值得细读的好材料。

《信息资源管理》内容丰富,结构合理,逻辑性强,文字精炼,读起来引人入胜。作者及时跟踪、充分借鉴西方 IRM 研究成果,并有新的综合、新的视野和新的发现,为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理论贡献。这突出地表明作者具有很高的信息管理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者曾在省级情报部门和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十多年的信息分析与研究,之后在中山大学从事信息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研究与教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写成这本如乌家培先生所称的“在信息资源管理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基础著作”。●

责任编辑:韦 前

在新的价值世界创造财富*

——“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述评

□黄锦奎

(深圳市南山区委,广东 深圳 518052)

[关键词] 知识经济 价值转化工程

[中图分类号] B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43-05

[编者按] 去年8月,本刊举办“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应征文章几百篇。在这些文章中,我们选取了几十篇与价值转化工程相关的论文编成《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一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今年8月上旬出版。待该书出版后,我们拟于8月下旬召开“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入选作者出席。因应征文章较多,我们无法一一回复。在这里,本刊对所有参与征文的学者深表敬意和感谢。

价值转化工程自1992年问世以来,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及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

1993年6月,《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该书内容在海内外各种报刊理论学术专栏连载,不少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价值转化工程的讨论与研究。

为更好地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及社会各方面有识之士深入地探讨这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有广泛研究前景的新学科,1993年11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特区经济》杂志社等联合召开了“全国首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童大林、黄家驹、周立群,著名哲学家黄楠

森、张江明、李德顺,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著名学者张作耀等一百多名全国各学科知名专家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价值转化工程这一新学科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如何进一步深化价值转化工程学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价值转化工程》一书充分地吸取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精华,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并运用这个体系的核心理论——价值转化论,应用于实际经济生活领域,创立了价值转化工程这门新学科,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在充分肯定这部著作的同时,与会代表还就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方面研究提出了意见。不少学者认为,价值问题涉及的面相当宽广,包括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对软价值转化问题,对精

* 此文是征文入选文章论文集的序言

神文化价值与物质价值的转化研究,开阔了经济学领域的新境界,这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新领域,需更深一步的探讨。与会代表倡议,筹备成立中国价值转化工程学会和中国价值科学学会及经济学分会,并建立挂靠于中国管理科学院的中国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所。

学界泰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价值转化工程》一书给予了很高评价:“《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讨论了价值哲学、价值学、价值转化学、价值转化工程与价值学学科体系,提出应将价值科学作为一大部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还有地理科学并列,成为 11 个大部门的体系。这是一个新思想。”哲学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指出“这是一项新的创造,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裨益”。

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激起了大家的研讨热情,全国十几家重点大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把价值转化工程这门新学科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和博士课题,有些学术刊物还专门开辟了价值转化工程学术专栏。我也应邀在北京、武汉、广州、广西、南京、西安等地作了几十场大型学术报告。《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英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中央广播电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及海外报纸等新闻传媒均对这一“点金术热”进行了追踪报道。几年来,不但在全国的科研机构、重点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支比较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在全国形成了覆盖于各行各业、城市与农村、不同阶层的读者群中的庞大业余实践型研究网络,这场“点金术热”至今不弱,实在超出

我的想象之外。

1998年初,全国形成了“知识经济热”,可以看成是 80 年代中期迎接高新技术革命与信息社会时代来临的讨论以来又一次放眼世界有影响的经济社会思潮,它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进取意识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使国人强烈地震撼。

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到来为价值转化工程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发展的空间和多姿多彩的舞台、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按现代价值科学与价值转化论的观点,知识经济中所讲的知识,就是把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更满足于人类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的价值高的物质的“窍门”,实质上,就是价值转化工程。被称为“现代点石成金术”的价值转化工程,就是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特点与规律,运用“知识”(包括硬科学的现代高新技术知识与软科学软技术知识),有效地改造客观事物,以最小代价促进客观事物的价值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有限的价值资源,提高客观事物的价值,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门现代综合软科学。

1998年8月应《学术研究》、《深圳特区报》理论部之约,我撰写了《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长篇论文,明确地指出了价值转化工程这门新学科作为现代知识经济智力工具的重要作用与对研究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该文发表后,《新华文摘》1998年11期予以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汇编·理论经济学卷》也刊发这一长篇论文,在全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各方面产生较大反响。应广大读者来信来电要求,由我倡议,《学术研究》从 1998

年8月份开始开辟了“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学术征文。即使由于稿约内容有些提得不很明确,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教授、研究生及实际工作者,包括一些省市领导踊跃来稿参与这一课题的讨论,可谓“盛况空前”。从几百件来稿看,主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对价值转化与知识经济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对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深化的一次极其可喜的收获。

从这次来稿的各方面看,既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博士及博导,又有从事实际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既有对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这一关系的探讨,又有对发展知识经济与研究价值转化工程的对策性探讨,来稿的总体学术水平和质量比较高。

东北财经大学徐玮的《知识经济时代:价值转化工程的新领域》,这是一篇有学术份量的文章,该文从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价值转化工程的运用提供了新的领域这一主题,对知识经济时代价值转化功能的生产力要素分析,以及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培育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途径等方面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苏州大学郭强、丁晓琴的《知识经济中知识价值转化指标的构建》一文是深化价值转化工程研究的优秀文章,特别提出建立知识价值转化指标的意义、知识价值转化指标的设定和构建、价值转化指标内容的探讨,丰富了价值转化工程研究内容,为价值转化工程的科学化、量化、精确化、严密性作了有益的探索。复旦大学的李志青的《知识经济学视野的价值转化工程》一文,从知识的生产研究、开发知识的消费及知识消费对经济学的挑战、知识的分配与转化等方面探讨了价值转化工程的问题,指出:“知识

生产、分配、消费分别回答了经济学的三个核心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什么生产,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了一幅知识价值转化工程的蓝图”,很有创意。宁波大学杨宁的《产学研结合与价值转化工程》一文,对知识经济、价值转化工程及产学研结合本质的认识,提出知识经济应更加注重价值转化工程,以及产学研结合是价值转化工程的有效实现途径,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大连理工大学俞明南、孙先锦、滕萍的《用价值转化理论推进价值工程的发展》,强调应重视价值转化工程理论对发展价值工程的指导作用,应用价值转化基本原理指导价值工程实践,重视运用软价值转化规律,以价值转化规律为导向,研究建立动态的价值工程体系。广东工学院丁松传的《“价值转化”初探》一文探讨了价值世界中的价值转化关系,提出了价值的构成与类型的新的见解。广州市职工业余大学陈绍忠的《价值转化工程与价值工程的互补》一文中探讨了价值转化工程理论一些基本原理对丰富价值工程的作用。嘉应大学古广胜的《资源配置与价值转化》一文探讨了资源在自发配置、计划配置、市场配置的价值转化,并提出了资源市场配置中非市场性选择的价值转化。广西大学商学院李欣广的《论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转化工程》一文,从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价值转化的新变化、价值转化工程的目标以及价值转化工程中社会劳动类型等方面对价值转化工程进行了新的探讨。浙江金融研究所金晓斌的《价值转化工程与风险投资制度框架》一文,是金融领域研究价值转化工程学的一篇有深度的优秀论文,该文从风险投资制度框架角度,提出了“价值转化的有效金融载体”的新观念,提出了在价值转化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体现在

对风险投资环境的营造上,建立第二板股票市场是连续风险投资与价值转化的桥梁,培育价值转化的金融之源,以及避免价值转化过程中的主体缺位现象等许多新观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田翠琴、高爱芝的《实现知识经济价值转化的有效途径》一文强调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寻求知识的价值转化即增值,职业技术教育在价值转化的工程中有特殊意义。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建的《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之我见》一文,从知识经济的关系与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以至创新成果的角度,强调价值转化工程的关键作用。深圳天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童运洪的《从宏观价值问题的提出看价值转化链》一文从宏观价值角度认识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价值转化以及宏观价值问题的价值转化所形成的链条关系以及产生的乘数效应,特别指出知识资源的价值转化问题,观点新颖。黑龙江省委党校宋天和、东北农业大学管理干部学院郎乃瑞的《论价值转化在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从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转化内涵、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有力地论证价值转化在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意义。天津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彭正银的《知识价值转化的效用分析及对企业竞争的影响》一文从知识价值转化的效用分析角度,认为知识梯度差距是价值转化的基础,创造需求能力是价值转化的关键,并从竞争核心、竞争因果、竞争本质、竞争内容、竞争策略等五个方面探讨知识价值转化工程对企业竞争的影响,这是一篇应用价值转化工程研究企业管理有深度的力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林平凡的《论企业科技创新系统的知识价值转化特性》一文,提出

知识价值转化能力是评价科技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标志,探讨企业科技创新系统的知识价值转化特性,从而强调以知识创造为中心,提高知识价值转化效率,以高新技术为重点,形成知识价值转化的优势的企业科技创新的新思路。江苏省通州市委党校沈刚克的《应用价值转化工程发展知识经济的途径》一文着重从价值转化的宏观角度,从五个方面论述强化价值转化工程在发展知识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作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刘邦凡的《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价值转化工程》一文,分析了知识变成资本使资本的价值构成发生的质的变化,知识资本的实现使货币的价值构成发生质的变化,这两个质的变化使知识货币的出现,而知识货币得以实现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货币价值转化工程的实现。文中提出了在现阶段我国开展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价值转化工程所采取的对策,从八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除了以上这些优秀论文之外,复旦大学曹绪飞的《知识的价值与价值转化——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透视知识经济》,河北省保定市科协王久华的《知识价值转化论——知识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贵州大学经济贸易系洪名勇的《知识价值转化论挑战传统经济理论》,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政治部李望一、胡逢清的《试论价值转化工程与未来社会价值的实现》,江苏省通州市委党校章新华的《知识经济与技术看其价值转化》,广州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黎东生的《知识经济中知识价值观的涵义及其经济价值转化》,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关锋的《简论知识价值转化》,江西萍乡市委党校张建光的《论科技创新与知识价值转化的相互作用》,河北师范大

学政法管理学院刘铁贵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谈知识价值转化论》，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徐玮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价值转化工程》，广东省委党校钟生坦、黄铁苗的《知识与综观经济效益》，武汉市政府副市长辜胜阻和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正友的《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抢占高技术产业制高点》，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生曾凡清、黄建军、丁志铭的《“知识——制度”互动原理与中国渐进式改革》，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许斗斗的《知识经济呼唤新的社会价值观及其价值转化》，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局黄海的《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转化作用》，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的好文章。

为了使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实际工作者更好地了解这次征文活动概貌，有利于学术交流，我们从几百份来稿中挑选了上述几十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同时也为了

使广大读者了解价值转化工程的一些原理、规律及方法，把我于 1992 年撰写的专著《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的部分章节收编入书。并把权威学者评价文章及一些重要报道附录于后，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价值转化工程发展概况。全书约 40 多万字，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及许多综合科学领域，本书只是探索的一个开端和初步科研成果。相信经过大家努力研究与探索，将进一步深化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的研究，为建立走向大科学体系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经济学，建立现代价值科学大厦新体系，发挥价值转化工程作为知识经济现代智力工具的作用，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发展我国知识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有益的贡献。●

责任编辑：冯 生

回顾五十年 跨入新世纪

□ 张江明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教授,广东 广州 510050)

[关键词]五十年 广东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48-03

建国后的50年中,广东社会科学的活动和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广东解放至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二是从省社联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三是从粉碎“四人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我同广东社会科学界的联系比较密切,广东解放不久,便任华南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1959年成立广东省社联筹委会,是委员之一;1978年省社联恢复活动,我分管理论和社联工作;后来专职做社联主席有7年时间。回顾50年来,广东社会科学经历着艰辛曲折、逐渐向上的历程,既有明媚的春天,又有狂风暴雨的袭击,经受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实践证明,广东社会科学队伍是一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队伍。

广东原有一批社会科学家,加上建国后杜国庠、陈唯实等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回到广东,大大加强了广东社会科学的力量和作用。在党的领导

下,广东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宣传唯物史观,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批判封建思想和唯心论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贯彻了“双百方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文学等领域的不同观点进行商榷,热烈争鸣,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探索。

可是,好景不长,在右和“左”,尤其是“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暴突然袭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社会科学界是重灾区。广东共错划右派分子37000多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5%(超额0.5%),是全国错划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加上凭“长官意志”、瞎指挥的院系调整,广东社会科学队伍大为减弱,在全国的地位下降。

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扬建议广东争取成为全国第三个社会科学中心的推动下,1960年广东社会科

学联合会成立,虽然在连绵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和阴晴圆缺的崎岖路径上缓慢行进,但广东社会科学学者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仍然获得新发展。卓炯提出和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是难能可贵的好榜样。

不久,一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社会科学界成为“革命的对象”,“五·一六”通知规定,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社会科学组织被宣布撤销,“扫地出门”,差不多全部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这是社会科学处在停顿、倒退和最困难的时期,而极左理论却得到推崇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林彪的机毁人亡,“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坚决执行“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我深深地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正确领导下,以及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广东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现代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实现了从教条到创新,从“注经”到科学,从封闭到开放,从单向到双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使广东社会科学走上新阶段,社会科学团体发展很快,学术活动极为活跃,学术研究不断提出新观点,创立不少新的学科,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例如,从社联成立至“文革”前共有 7 个学会 5000 多会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发展到 130 个学会,14 万多会员,还成立市、县社联 31 个,形成一支包括 4 个系统 10 多万人的社会科学队伍;具有广东特色的新学科不断出现,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特区经济学,外向型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华侨学,精神文明学,中华民族凝聚力学,社会主义辩证法和现代化辩证法等,其中社会主义辩证法成立全国性组织,挂靠于广东,已召开 13 次全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有 10 次在外省市召开),还到前苏联进行学术交流,得到好评。

广东社会科学 50 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更要着重于应用研究,重视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经验、新矛盾,上升到理论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选准课题开展系列研讨,是把学术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发扬学术民主,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科学的必要条件;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相结合,是发挥社会科学的智囊作用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好办法;大力培养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老中青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后继有人和后来居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的保证。

我们经历的 50 年即将过去,跨入新世纪的 50 年快要来临。21 世纪对社会科学提出多方面的严峻的挑战,又是社会科学存在大发展的良好的机遇。在 21 世纪的前 50 年,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日益增强,逐步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期,世界竞争将主要是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社会科学是人类两大智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

要更加重视社会科学,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缓慢地曲折地从低潮走向新的高潮,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出现新的形式、新的途径和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必将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新的理论。在21世纪,社会科学必将有新的更大的和更高的发展。因此,在跨入新世纪中,社会科学不能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强。社联同文联、科协等一样是群众性中介性组织,四个系统——大专院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分别参加各个学会,或是社联委员与主席团成员。它代表社会科学界成为党与政府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科学院是专业研究社会科学的组织,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江泽民同志很重视社会科学,认为社联的作

用,一是能发挥加强党和政府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二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和参与决策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发挥咨询服务作用;四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论水平提高发挥宣传普及作用。1998年3月19日又题词:“发挥社联作用 繁荣社会科学”。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社科联组织,应明确认清在跨入新世纪中的责任重大,担负着发展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使命,要更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发扬创新精神,为繁荣广东社会科学和发展社会科学理论而努力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冯 生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得与失

□ 赵兴彬

(山东泰安师专政史系副教授, 山东 泰安 271000)

[关键词] 中国史学 史学理论 当代

[摘要] 本文以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大势作为参照系, 横向地剖析了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成就与不足以及改革的方略等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51-07

站在新世纪门槛之前, 人们都在反思过去。而目前史学界的反思, 多是微观重于宏观, 即使宏观考察, 也多从纵向或史学史的角度入手, 这不利于发挥史学理论的透视威力。本文试图把当代中国史学与 20 世纪世界史学的发展大势相联系, 作一横向的理论考察, 以探求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成就、不足及其改革方略诸多问题。

一、20 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大势

20 世纪世界史坛的主流和弄潮儿, 当为西方史学。它自近代以来已经历了五次深刻的反省, ①并呈现过三种史学形态。②其中的后两次变革正发生在 20 世纪, 分别以 1912 年美国历史学家鲁宾逊出版《新史学》和 1955 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出版《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为界标。③二者的共同使命都是向兰克史学发难, 彻底清除实证主义史学弊端, 确立新史学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得到了相

当的发展。如果我们再从横向的角度加以剖析, 就可以概括出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如下发展大势。

第一, 历史哲学发生转向, 即从思辨历史哲学转变为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 并由此形成了历史学家的“总体历史”观念。这一转变过程是从斯宾格勒和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 经过汤因比到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克罗齐、柯林武德而完成的。④第二, 在“总体历史”观念下, 西方新史学家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 全方位地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理与情感等多方面的关系, 产生了五彩缤纷的多种史学流派和分支。80 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又兴起了“公众史学”; 法国年鉴派新人则活跃于广播影视界和出版界; “新叙事史”⑤的勃兴亦倍受关注。第三, 研究方法的巨大变革, 为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新史学家们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大力开

展跨学科研究,产生了许多历史学的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精确化,大量采用分析模型、数理统计和计算机方法;创用追溯方法研究史料极少甚或没有史料的领域中的问题;开辟多种途径(如调查、访问、录音、录像、追溯等)搜寻新史料;历史编纂方法上创立了“新叙事史”体裁。⑥第四,在西方新史学迅猛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得以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繁盛、兰克学派的危机,以及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的正确性等因素导致的。尤其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敌视到宽容再到互相对话、相互借鉴的巨大转变,则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⑦

二、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成就

如果仅从纵向来审视当代中国史学,则人们习惯于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即1919—1930年是我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期;1930—1949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时代;1949—1976年是既继承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的传统,也继承了第一代实证史学成果,形成完整体系,同时又深受“左”的思想影响时期;1976年至今是相对而言的探索时代。⑧然而,如果我们以前述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大势为参照系,横向地剖析当代中国史学,就会发现如下一些成就。

(一)在与国外史学界的频繁对话和交流中阔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飞速发展,成绩斐然,“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打破封闭对外开放、与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发展和信息的沟通,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⑨

我国史学界与国际间频繁交流、对话的盛况,首先表现为大量引进、吸收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以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为例,于沛先生认为,整个20世纪,我国大约经历了三个大规模的引进阶段,⑩而其中自70年代末以来的这一阶段,则是以往任何时期无与伦比的。国内历届史学理论讨论会上,总要把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作为重要议题讨论;连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在国际史坛上有重大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并广泛、深入地予以研究。⑪其次是情报信息交流。这主要是通过几个重要的交流工具实现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几个情报杂志,⑫以及历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文摘》、《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等。再次是人才交流。国家选派了大批史学人才出国留学或作访问学者,其中的一些人担当了史学交流的重要使者。来中国讲学的外国知名学者也司空见惯,“许多年高资深的美国学者(其中不乏本会会员)已经访问过中国。他们的讲课吸引了大批中国听众,他们组织的美国研究讲习班邀请了中国各地的学者,他们还向中国各地的大学和图书馆赠送了图书。”⑬张芝联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一文中,也罗列了一大串来华讲学者的名字。⑭第四是会议交流。我国史学界已分别于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5年四次组团,参加了第十五至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内还经常召开专题性国际学术会议,如1995年1月在海口市召开的首次“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就“堪称中国与海外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一次空前盛会”。⑮第五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倍加关注。阵容庞大、手段先进、成果丰硕、观点新颖的海外中国学研

究,强烈地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兴趣,在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热潮。介绍、翻译、评价海外中国学的论著层出不穷。对于国内的这股学术热潮,有的学者已作了初步总结。^{①⑥}前述“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召开,也是这一趋向的体现。

(二)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兴起和日益走向深化。

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在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与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相结合,曾写出过不少理论著作。^{①⑦}但建国以后近40年,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1983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胜利召开的鼓舞下,我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才重新兴起并一度成为史学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产生了许多发聋振聩的新观点。^{①⑧}目前的状态虽然不再那么火爆,但“史学理论研究正在深入”。^{①⑨}

我国新时期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对于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这是我国历史学取得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第二,在教学方面,自1989年以后,全国高校历史专业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有的还开设了诸如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等更高层次的理论课程。第三,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不断出版,越来越多的课题被提出来讨论。^{②⑩}第四,出现了专门的史学理论研究机构、杂志和专门的研究生。第五,从1984年开始每一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对于总结和推动全国史学理论研究起了重大的作用。第六,最近两三年,史学理论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例如对“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的专题研究的开拓和深入”、“对外国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更为拓宽和深入”、“对

史学理论范围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新的探索”。^{②①}

(三)“现代化”研究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已成为过去的人类历史,但这绝不成为历史学家远离现实的根据。因为历史学家总是当代的,因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历史学家只为历史而历史,漠不关心现实,那么历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出现“史学危机”。这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作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不断向历史学家发出召唤,历史学家对此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历史学界率先开展“现代化”研究且成就辉煌的学者,当属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荣渠教授。他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其后,他又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②②}形成了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架构。在罗荣渠的推动下,1987年底,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首开了“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多次主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现代化研究的学术会议。这都在学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

罗荣渠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代表了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力度和研究深度。除此之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很有影响,如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时和兴的《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等等论著。

如果从最狭义的层次理解,史学界所广泛关注的“现代化”课题,当然包括“历史学自身的现代化”这一含义,它是伴随着“史学危机”、“史学改革”的呼声而出现的命题。近20年来,史学界提出

了种种史学改革的美好设想或方案,为我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四)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的探求向多层次发展。

历史现象探求的多层次化,集中体现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无限拓宽和各种研究新课题的层出不穷。我们依据肖黎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可以看出,在中国史方面,史学工作者面向现实选题,不断开阔视野,热点频出;不但各门断代史和综合性通史一步一重天,而且基本建立起了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各种专门史的名目也越来越多。在外国史方面,东西欧史、美国史、苏联史、亚洲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西方史学史,已成了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许多外国史学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引进,增添了我国史坛的活力。

历史规律包括微观和宏观两种层次。前者往往与具体历史现象的探讨互为表里,后者则主要指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动力、速度以及社会形态的演进诸多方面。由于1978年以前史学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有重大偏颇,只把人类历史简单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把历史的主人片面理解为“劳动人民”,所以对宏观历史规律的揭示极为肤浅、粗暴。但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提高,对宏观历史规律的探求则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根据蒋大椿先生的论述,^②可以看到,目前人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已有5种观点,而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则有12种之多。“五种社会形态说”发生了动摇,出现了“三形态”、“四形态”和“六形态”说。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更受到了猛烈挑战,并一度引

发过全国性大讨论,形成了至今6种观点并存的局面。

(五)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加多样化。

历史知识普及的关键是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国历史学本有注重通俗化的良好传统,写出过不少历史演义、话本等形式的通俗著作。但由于“文革”时期,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只有考据才是真功夫”的双重错误观念下,历史学要么成了御用史学,要么钻入“象牙之塔”,脱离现实和公众,陷入危机。80年代初,学术界在讨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理论问题时,随之有了“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之说。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史学工作者以通俗的历史内容和形式,展开了历史知识多样化的普及过程。

“所谓通俗史学系指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科普化;是史学工作者把某些历史内容搬出‘象牙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利用现代化传媒与广大公众见面,并成为广大公众的精神食粮。”^④这就是说,通俗史学应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内容通俗、形式通俗和传播手段大众化与现代化。而这些也是我国20年来历史知识普及实践的概括。

从内容上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所普及的历史知识,主要是历史故事和文化典籍的校点、今译,那么如今则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无限拓展而无所不及。如历史上的科技、工业、财政、货币、法制、都邑、改革、民间文化,甚至宫闱秘事、凶杀情仇之类的庸俗内容也在普及之列。当然,一些事关人类生存与生活的重大内容的普及,也影响深远。如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1993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历史启示》、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理学的思考》等。

从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来看,以往是以各种文字著述为主要形式,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史诗。传播手段和途径主要是报刊、杂志和各级教科书。如今,除了这些形式和手段仍被沿用外,音像和电脑多媒体技术正在变为主流。假如我们把现有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按时代顺序排列起来,那已经是一部鲜活的“影视中国通史”了。

面对影视历史片的汹涌之势,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已着手从理论上加以探索。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就正式提出了“影视史学”概念,并作了初步论述。^⑤另外,电脑多媒体技术和 Internet 的开通,也必将为历史知识的普及提供更先进的手段。

不久前,历史学家林甘泉先生又对 70 年代末以来的我国历史学作了简要总结,指出了六个方面的成绩。^⑥总之,如果说中国当代史学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在曲折的道路上漫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回到了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在与世界史学的发展大势基本适应的前提下,向世界先进史学水平靠拢。中国史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史学的影响,而中国史学的每一次进步,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三、当前中国史学的问题与不足

当前我国历史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首先表现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大为减少。80 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曾热点频出,如“历史的创造者”问题、“三论”问题、“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都吸引了史学界众多的人,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最近两三年尽管发表与出版了不少史学理论论著,但并未产生强烈共鸣和

广泛反响。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外,恐怕与史学工作者的浮躁心态不无关系。其次是研究对象的日益琐碎。不少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事、一物、一人的零星研究,忽视对历史事物整体性研究,正在出现像法国第三代年鉴派出现过的那种“碎化”现象。再次是选题的趋同化和庸俗化。前者表现为某一题材一旦成为热点,则相同的选题就会纷至沓来。例如文化热沸腾之时,史学界数不清的选题都成了文化,好像不冠以“文化”二字,就显得作者无文化。后者表现为选题的低级趣味和市侩习气。什么后宫乱伦、皇后的面首、皇帝的答应、房事术之类的题材充斥于市,颇有向文学领域“三房”(卧房、浴房、产房)题材看齐的势头。第四是史学成果的过剩化与泡沫化。近年史学界似乎进入了一种怪圈:这边是庸俗化的作品供不应求,那边的学术论著则无人问津;一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史学作品发表、出版,另一方面学者仍不断抱怨学术著作发表难、出版难。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的根源归咎于“史学过剩”^⑦是颇耐人寻味的。但“史学过剩”的原因又是什么?恐怕与史学工作者浮躁心态下急功近利、成果泡沫化这一因素不无关系。史学界有的人或为一举成名,或为追求成果数量,竟然能在一年内发表数十篇论文,还有的能在一年内出版 7 本专著,字数达上千万。这些有悖学术规律的做法,其学术成果的质量到底如何,不能不使人怀疑。第五是学风的轻浮化。学风问题包括诸多内涵,前述浮躁心态、急功近利即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成果也是一种坏学风,就像瞿林东先生批评的那样,“明明是参考了、借鉴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著中,不作说明、不注出处,以至故意向读者加以隐瞒,从

而把自己装扮成某个观点、某种见解的提出者、首倡者”。^⑳另外,轻视史料和古汉语功夫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教条化倾向,也是学风轻浮化的表现。第六是人才培养的盲目化。国家在历史专业人才的招生、教学、分配、协调诸多环节上,都有不完善之处,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应,造成了史学队伍的过于庞大和人才浪费。

当前我国历史学的种种不足,是制约我国历史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症结所在,这就为我们的史学改革提供了切入点。

四、中国史学的改革方略

当代中国史学若要以新的姿态奔向21世纪,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但史学如何改革?则既是实践中的任务,又是理论上探讨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提出过种种改革措施和方案,有些已付诸实施,有些则仍在讨论。我们这里在已有方案的基础上,也提出几点改革设想。

一要明确改革目标。我国历史学的改革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观念下的社会主义新史学。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走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用新时代的最高思维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彻底与根深蒂固的“老教条主义”和冠冕堂皇的新教条主义决裂。其二,追求历史学的全方位价值。只有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本是三位一体的价值)兼顾,才能真正避免基础与应用脱节、雅与俗的对立。其三,形成推动史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如理论指导机制、处理与社会关系的机制、具体研究机制、内部分工协调机制、价值实现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应用机制等。

二要立足于改革的启动点。这种启动点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思维。

为此,必须走出旧史学为历史而历史、为政治服务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在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培养新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信息观念。

三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是两个堡垒:首先是史学管理和研究体制堡垒。目前的研究机构设置、日常运转、研究方向、选题、评估、职称评审、人才培养等由政府直接包办的现象,^㉑必须坚决变革,变为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国际学术管理的规范模式。其次是人才培养体制堡垒。要使大学生、研究生的招生计划适应社会需要,不能人为地扩大数额。要从中学开始彻底改革文理分家的学科格局。

四要摸索改革的运行模式。有人提出了“三维推进”的改革运行模式。即:平面方向上,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追求历史研究的宽度、跨度和密度;在交叉关系上,广泛建立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追求研究的浓度和热度;在空间方向上,提高研究层次,追求历史研究的深度和高度。^⑳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正确的。●

①参见张广智:《时代变革与近代西方史学的反省》,《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②罗风礼先生概括为: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的”新史学。详见其《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一文,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③学术界也有另一种观点,即把1929年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作为西方新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④参见马小彦:《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到克罗齐》,《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于沛:《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陈勇、罗通秀编:《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150页。

⑤马雪萍认为:“新叙事史既不是向传统

史学模式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新史学’的全面否定,它的出现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模式相互补充的结果。”见《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与当前的新取向——兼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⑥参见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⑦见徐浩:《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变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2期;董进泉编:《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⑧见戴逸在“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⑨陈启能:《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

⑩于沛认为三个阶段是:二三十年代引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六十年代译介、宣传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七十年代末以来广泛、深入地介绍和研究西方大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见《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⑪见前引于沛先生文。

⑫即《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科动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国外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

⑬[美]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化》,《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

⑭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⑮江梧桐:《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⑯详见朱政惠:《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陈启能:《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⑰如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吴渊民的《史学通义》、曹佐熙

的《史学通论》、何炳松的《通史新义》与《历史研究法》、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李大钊的《史学要论》。

⑱详见周朝民等主编《历史学新论点》,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⑲⑳蒋大椿:《史学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深入点》,《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㉑详见赵吉惠:《史学理论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仲伟民:《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座谈会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㉒关于罗荣渠的现代化论著篇目,参见杨玉圣:《在探索中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者气象》,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沈汉:《悼念罗荣渠教授》,《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王加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开创之作——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杨辰起:《博通宏识锐意进取不懈——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㉓见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2页。

㉔张晓校:《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

㉕详见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

㉖详见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㉗见王东:《中国当代史学的困境与误区》,《河北学刊》1996年第1期。

㉘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㉙见陈国灿:《世纪之交中国史学改革的目标与突破口》,《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㉚详见胡维革:《史学改革大思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开新

□ 吴雁南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00)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文化建设

[摘 要] 中华民族在不断的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历史性, 又存在超前的现象; 既具有永恒性、连续性的一面, 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了解了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 我们就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 继承与开新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58-04

近十年来, 一些学术活动引发了我再次对中华文化研究的兴趣。在此, 拟从文化的永恒与局限角度谈以下三点关于中华文化继承与开新的粗浅之见。

一、超越与历史时空

中华民族在生生不息的发展中, 不但成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 而且创造了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的先人一代代不断创新的过程。毫无疑问, 这种创新是值得充分肯定, 甚至是加倍礼赞的; 但并非他们突发奇想, 刻意为创新而创新所做作出来的, 只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 立足当世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这种贡献, 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成就的, 体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精神。而前一个时代的创新, 又为下一个或几个历史时代的创新、再创新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中华文化的这种生生不息, 既是一种新陈代谢, 又是一种吐故纳新。中华文化不仅善于纳本土本族之新, 而且善于包容、吸取、融合

外来文化。这种创新、再创新的过程, 循环往复, 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化, 注入新内容、新养分, 使其永不凋零。

历史时空的存在, 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一定的历史时代的文化乃一定的历史时空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但并不排除在中华文化中存在超前的现象。众所周知, 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大同理想, 从春秋战国到中国近代, 经过几十代, 或者说近百代志士仁人的求索, 先后在战国时期、汉末魏晋之际、宋元时期、明末清初、晚清等历史时期一再出现大同思潮的高潮。人们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 与其说是对原始公社的回眸, 毋宁视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期。无疑这种文化现象和意识是超前的。在战国时期, 儒、墨、道、农、杂诸家, 均曾抒发乌托邦思想主张, 他们苦心孤诣地编制古圣先贤的准则, 幻想利用它来创制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 创建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自由、太平的理想社会生活。①诸家之中对理想社会蓝图之构铸, 亦是议论纷纷,

以至激烈论争,其中以孟子之拒杨、墨最为典型。墨子“兼爱”所倡导的是一种无差等的对人类之爱,杨子“为我”、“不为富贵所淫”,有“如隐逸高洁之操”。近乎道家一流之乌托邦。在孟子看来,墨子超越现实,走得太远;杨子只是“自洁其身”、“视斯民之水火而不肯援手”,^②前者过,后者不及。他既主张把大同世界作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又主张面对现实,爱有差等,^③把超越与现实、终极的理想标的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儒家的学说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诚然有种种因素,但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永恒与局限

随着时空的推移与变易,文化不断在创新中发展与变化。在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受着时代的局限,却并不排除在其开新的过程中萌发和成就一些永恒的文化珍品。如中华文化中穷、变、通、久的变易观,实事求是的作风,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对“至治”的理想社会、“至善”的理想人格、“至佳”的处世原则的不懈追求,勤劳、勇敢、大无畏的精神,等等。应当说,这都是超越时空足以永恒存在并发扬光大的。如果说永恒的文化珍品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反之,超越时空的并不都具有永恒性。历史上的大同理想是超越时空的,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却不是永恒的思想文化,只有其对“至治”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才具有永恒的性质。

前文已经讲到,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即使是具有永恒或超越品格的文化亦莫能外。这种局限,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以中国封建社会而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宗法思想,成为一个历

史时代的共识。在那个历史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无不用宗法式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社会问题和政权问题,使其政治思想主张,深深打上这种局限的烙印。因而无论是代表地主阶级思潮的乌托邦,还是反映农民意愿的乌托邦,无不以“圣人之政”相标尚,给古代乌托邦打上皇权主义的烙印。当然由于农民同地主处于不同阶级地位而且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在政治思想上亦有针锋相对的一面。众所周知,儒学标尚尧舜、三代之治,追求圣贤景象。历代封建统治者,或励精图治,求其统治之长治久安,或欺骗群众,缓和阶级矛盾,无不以德治、仁政相标尚。当然,就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其最有兴趣的热点是封建伦理纲常,要求广大劳动群众绝对服从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供其奴役;而广大劳动群众最有兴趣的热点,则是德治、仁政,安定的社会,他们渴望高高在上的圣君贤相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阳光。当封建统治者背弃儒家所标尚的德治、仁政,为桀为纣,不顾人们的死活,恣意鱼肉群众,将其驱迫至死亡边缘时,广大群众即挺身而出,指斥统治者无道,讨暴君,杀贪官,要求以“真命天子”代替“假命天子”。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局限,封建社会即使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永恒品格的珍品,亦无不打上封建主义烙印。地主阶级一方面倡言仁爱,另一方面又编造种种理论残酷剥削压迫劳苦大众,在其社会实践中,往往以一己的阶级之爱代替“人类的爱”。在阶级社会里,这种阶级局限,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阶级消亡了,文化的时代局限性仍然存在。只要社会在进步发展,随着历史时空的推移,后一时代的文化必然超过前一时代。就此而论,文化的时代局限性将伴随其永恒性永存。

三、继承与开新

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永恒性的一面、连续性的一面,就知道对自己的文化必须一代代承传下去;了解了这种文化因受一定历史时空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必须立足现实,进行取舍,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创新。

一般说来,具有超越和永恒品格的文化遗产大都是中华文化中的珍品,亦即精华所在。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非都属于永恒的和超前的东西。

如何区分精华和糟粕,历来是人们所苦心探索的问题。早在本世纪初,孙中山就曾明确提出要“吸取我们民族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④希图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对中华传统文化亦来个“翻陈出新”。^⑤他既指斥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而贱中华典籍,又反对闭目塞听,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可惜,他提出的这种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思想主张并没有付诸实践。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关于创获中国新文化的讨论日益高涨。直至1940年,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经过总结提高,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文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就为中国人民展示了一条科学的文化建设纲领,亦即区别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标尺。以这一光辉思想为武器,批判了唯洋是尊的“全盘西化”思想,批判了颂古非今,唯古是崇的思想,使当时的文化建设得到巨大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在实践中虽一度背离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主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破四旧”的浪潮,把传统文化糟踏得不成样子;但这并不损害毛泽东关于创建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科

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思想主张的光辉。当然,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也是有某种局限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半个多世纪以前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里,论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时,认为有以下几层意思,应该理会清楚:一是传统的旧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根本就带有一般性或共同性,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什么冲突,这当然很容易接受。二是传统旧文化中,有些东西,虽然它原来的具体形态和现代生活不能相容;然而因为时代的转变,它那具体形态早已失掉,不致再混入现代生活中;现在留给我们的乃是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并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这当然也可以接受。三是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看起来乌烟瘴气,但其中却包含一种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应从神秘外衣中,剥取合理的核心。四是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从现代眼光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道理,甚至还很荒谬,然而在当时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对于这些,不妨舍其本身,而单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⑥这些观点,至今尚很有借鉴意义。

由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在以农立国的宗法制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表现出两重性。以儒学为例,其既讲因革变易,又标尚时

中不变;既提倡独立思考,倡说对其经典《尚书》不能尽信,要敢于藐视不尊礼义的大人物,又宣称君子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之言;既标尚忠信,又声言只要合乎大道,即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既标尚汤、武革命,除暴安民,又倡说事君必忠,不许造反;既要人立大志,标尚君子要以身殉道,行不由径,又谓君子可为免于贫困致死而仕,以至去讨好声名不佳的女人,企图谋求一定的职位,如此等等。上述孔、孟言论两重性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根本因素,实深深植根于农业社会的经济之中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诸种因素。西汉以后儒学的这种两重性和多面性就更为庞杂。虽然儒家文化为中华文化之主导,但中华文化的内涵却比儒家文化更为广泛、丰富,决不能在儒家文化同中华文化之间划一个等号。尽管二者之间有一定差异,却都存在着两重性,进步与局限、民主性与封建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科学与迷信、开拓求新与因循守旧、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正面与负面统一于一体。一般地说,传统文化中进步的、积极的、正面的内容都可谓精华,反之即为糟粕。吸其精华,主要是吸取传统文化中具有开放性、民主性、科学性的内核和追求理想社会、理想人格、处事必求至佳至善、自强不息、日新不已的精神;弃其糟粕,主要是摒弃其封建性、封闭性、因循守旧和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的糟粕。

但是,如何吸其精华,开新中华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早在30多年前,曾有人说,越是精华越要批判,这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虑,对于历史上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搬呢?如广为人所称道的民本主义思想,我们亦只能

取其重视民众的一面,而弃其为民作主的君权思想;又如对人道的追求、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其中充满民主性精华,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珍品,其由此推演出的古代乌托邦思潮与近代大同思潮,亦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但这种思想特别是“有饭大家吃、吃大锅饭”的思想,却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负。这是因为植根于以农立国的宗法制的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即使其精华也具有时代局限或阶级局限性。因而对传统文化,既要坚决反对“这也要批、那也要批”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又不能照搬、拿来就用,而是要立足中国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方向和指针,继承和开新中华文化。●

①参见吴雁南等主编:《古代乌托邦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上册,成都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14页。

②以上见《孟子性备万物图说》、《烟霞草堂遗书》之六。

③那时候,宗法式的思维方式是各社会阶级、社会集团普通的思维方式,请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因此爱有差等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

④《〈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

⑤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页。

⑥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原载《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四期(1940年2月15日),转载《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本文转述时尽可能用该文的原话。

责任编辑:郭秀文

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

——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 200437)

[关键词]基督教 重塑 传播

[摘要]宗教的精神力量及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结合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有助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并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宗教的思想力量与近代民族意识的糅合,则使基督教在中韩两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62-07

基督教对近代中韩人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藉此一端,探寻宗教的力量,亦即宗教对某个国家或某个文明在某一时段对社会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看来,宗教的作用有时是彰而不隐的,一种短暂的、突显的力量;但更多地则表现为隐而不彰的,一种持久的、潜在的精神上的力量。

拙文捭拾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例,就宗教对心灵重塑略说己见,稚拙与不当之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教正。

—

我们的讨论且从 26 年前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中所说及的宗教的作用谈起。

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信奉基督教,而日本文化名人池田大作崇

尚佛教,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都确信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源泉。两人在谈及宗教的作用及其与文明的关系时,汤因比发表了一些为后人所瞩目的高论:

汤因比认为,建设文明的条件是生产的剩余,也就是说,人们要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最低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唯其如此,才使得那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当然有赖于广大群众的协作,而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精神上的纽带,正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汤因比进而指出,各种文明形态,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各种文明的产生及其得以延续下来的生机的源泉,也在于宗教;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其结论就是“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①

在这里,汤因比高度评估了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宗教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只要稍

^{*} 本文系作者为 1998 年 11 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基督教与近代中韩人的思想观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供本刊发表时,作者对全文又作了增补与修改。

稍检察一下世界文明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觉汤氏之论,并非虚妄。

本文主要论及基督教。众所周知,基督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其诞生之初,基督徒就笃信其教派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便把它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向四方传播,为此更有众多舍命殉道的动人事迹。在欧洲,基督教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支配欧洲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在中古欧洲居于“万流归宗”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②

与佛教、伊斯兰教同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亦诞生于狭隘的、地方性的、相互闭塞的农本经济的时代,但与前两者相比,基督教在其产生之后便以迅猛之势越出了地区与民族的限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其影响与威力可能是佛教与伊斯兰教所难以企及的。这是为什么?除了基督教发展及传道事业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等因素外,看来还得从基督教的自身,从基督教的教义、宗教信仰及其所体现的宗教力量中来寻找。笔者曾就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区别,即基督教自身所蕴含的自我革新的传统及变化不息的精神这一角度谈论过这一问题,^③这里从基督教对人的心灵重塑所起的作用,稍作补充。

基督教对人类精神领域的重铸,首先在于它所宣扬的宇宙观,上帝创世,上帝的意志显现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这是基督教所揭示的宇宙构架的最基本点,而人只不过是执行或依循上帝旨意的一种工具而已。公元五世纪时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曾用这样的语言称颂过上帝:“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④这段话道出了基督教的“上帝观”,说出了一种对人以外的力量或

是一种宇宙原则的体认。

此外,基督教在揭示宇宙构造的同时,还要给人类的行动指出方向。如果宗教没有这种作用,并丝毫不涉及每个人所接触到的“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换言之,不关注人类心灵的重建,不关注“重生其精神生命”,^⑤并从思想上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求,那么它所显现的力量将是微乎其微的。这里势必说到信仰的力量。事实上,信仰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对人们“重生其精神生命”的巨大力量。怀着这种信念的基督徒,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其他人,并在他们身上为这种笃诚的信仰而满怀希望,“是在希望一场有利于一切人的革命,是在希望一场解放冤屈的受难者、被忘却者、甚至死者的革命,这种希望不会削弱历史的主动精神和一切人之主体性而进行的斗争;它反而将确保人们的行事准则的可靠性,使他们面临正义者日益深重的苦难,不断反抗占统治地位的非正义状况。”^⑥唯其这种希望的存在,这种信仰的存在,才使它构成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一种指导人生、战胜人生之旅中的种种困难的内在驱动力,一种经久不息的使这一教派得以世代赓续与繁衍的原动力。这也许是本文所说的“心灵重塑”之题中应有之义。

二

宗教的精神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思想上对人们重塑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结合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实践,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这一点。然而,在近代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回应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对此,我们“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⑦

必须指出,近代以来,中韩两国有其相似的历史大背景:一方面是列强环伺,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另一方面是八方风雨,血肉纷飞,惊天动地。尤其两国置身于“东亚文明圈”的共

同文化背景,哺育了坚韧不拔、反抗强暴的精神元素,铸就了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与富国强兵的民族性格。为了强化与印证这一论述,这里特引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一段揭示甲申农民起义(1894年)原因时的论述,他写道:“门户开放以后,资本主义侵略对农民经济的打击;执政阶层对外国势力的妥协和屈从;因国际纠纷以及制度改革而产生的政府财政困难和农民的负担过重;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不顾农民贫困的无休止的政争;农村知识分子经济的破落和他们的政治意识、领导能力的提高;由于外国势力的侵略,农民阶层危机意识的增强以及他们的政治、社会意识的提高;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阶层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涌进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而产生的破落以及他们与农民阶层产生的联系等等。”^⑧姜氏所分析的这七点,不仅可以揭示韩国甲申农民起义的近因,也可由此观照19世纪末韩国所处的那种内乱与外患相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特征,我们并可藉此比照与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相类似的历史变迁。

但是,在这种大体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却可窥见基督教在这两国所演绎出来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历史文化的不同场景。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第一,基督教有助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对此,我们的分析且从“飘荡的心灵”(homeless mind)生发开去。

“飘荡的心灵”是西方社会学家勃格等人的用词,^⑨原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产生的那种难以安身立命、无所依属的“疏离”与“飘荡”感,借用这个词,来描述宗教对人们寻求心灵的安顿与重建所起的作用,我以为也是可以的。

近世以来的中韩两国,社会剧变,世事纷繁,内忧外患,人心惑乱,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转型期正是宗教得以滋生与发展的温床,使得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基督教,成了处于苦痛中的人们抚平心灵创伤、寻求精神慰藉的“家园”。不管怎样,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都

有发展。在中国,即使在被宗教史家称作“反基”最激烈的19世纪60—90年代末,传教事业也有推进。以信教人数而言,基督教新教从1860年的2000人增至19世纪末的8万人,^⑩天主教从1860年的40万人增至19世纪末的70万人。^⑪

在近代韩国,自1784年韩国儒生李承薰自北京带回天主教,创立朝鲜教会后,其教势日趋发展。至19世纪末,朝鲜政府取消了禁压西教令,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前已有教徒7万余人。至于新教(Protestantism),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传教士的努力,其传道事业的成就则远胜前者,至1920年信徒已达20余万人,此时天主教徒才9万人。^⑫

从近代中韩两国基督教的传道事业来看,虽然我们不能排斥各种非信仰理由而入教的人(“吃教者”),但从总体上看,基于信仰力量的入教者还是占主流,即生活在苦难与不安之中的人们,通过入教,“使他们得到安定和安慰的精神上的满足”。^⑬1910年韩国基督教史上所发生的“百万人救灵运动”,即为显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传道运动。为了复兴韩国教会,振兴基督教,据称在这次运动中,信徒传道时间达10万日,花去的传道纸100万张,所散发的福音篇章达70万份。^⑭这次百万人的“救灵运动”,虽然未达到大量吸收信徒数量的目标,但对基督教徒的心灵重建却发生巨大的影响,它“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和平,使人们感到基督教会使一切不足感到充实”,^⑮亦如王尔敏所说的基督教所能萌发与蕴含的“思想之启发”的意义。^⑯比较起来,基督教在思想上对韩人的影响,在即将到来的以宗教为后盾进行的爱国运动中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

第二,基督教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从西土传入东亚的教派,基督教对中韩两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势必会对人们的政治判断、法律态度、道德规范、艺术见解、科学认识、教育方略乃至生活

方式、坊间习俗等产生或隐或彰的影响。

以教育而言,基督教的传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韩国,在改新教的传道事业中,其教育一项颇有建树,它所奠基的韩国基督教青年会、韩国基督教女子青年会等组织,它所创办的许多教会学校力破中古教育之陋习,开西洋教学之风气,不啻“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场大革命”。^{①7}尤其是随着欧美西式教育课程的设置,学科专业分类的精细,应用性专业教育的实施,尤其是女子专门学校的开办等等,^{①8}不仅一扫封建教育之陈腐,而且也是从早先的基要主义向社会福音转向的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

无独有偶,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教育事业在价值观念上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学生,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观念渐入学子心田,于是欧美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思想中萌发增长。如教会学校的一位学生在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作文中,这样写道:“知识是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的基础,可以安放在它的上面。”^{①9}近代欧洲哲人的“知识进步说”通过 19 世纪的一位中国学子,跃然纸上!

第三,宗教的思想力量与近代民族意识,尤其与近代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的糅合,使基督教在中韩两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韩国,尤其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最初一二十年内,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基督教与韩国广大民众之间出现了某种亲和性。基督教的救赎、福音观念与韩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特定条件下找到了某种契合点。有论者曰:“韩国基督教兼具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这一特征肇始于前殖民时期。而日本殖民当局对基督教的压迫,则加强了业已存在的观念并使之更为明确。”^{②0}在我看来,这当然不失为一家之言。倘如是,那种把“宗教当成一种社会补药的倾向,认为它可

以用于民族危亡的时期,以便从人民身上发掘出更高的道德努力”的观点斥之为“贝拉基主义”的观点,似乎是一种皮相之见了。^{②1}

1919 年韩国发生了“三一”运动,基督教在这场运动中与韩民族的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基督教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的力量,尤其是它与处在危亡时期近代国家的民族意识的涵化,其在思想上所起的巨大的鼓舞作用是难以泯灭和不可小视的,此处不再申论。^{②2}

反观近代中国,在相近的历史时期内,基督教岂但命运多舛,而且反基言词与行动凶猛,其中尤以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及 1922 年至 1927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为最烈。为什么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不具亲和性,反遭致强烈的敌对性呢?这当然是中韩基督教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其因有待深入求索,就我浅见,以下二点,似乎不可忽视。

一是在大体相同的历史大背景下,近代中韩两国所处的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基督教入华时,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之下,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海外华裔宗教学者秦家懿教授指出:“我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 19 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②3}与此相反,基督教入韩时,与西方列强矛盾相对较为缓和,冲突亦少。1910 年日本吞并韩国后,反日成了韩人的众矢之的,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使作为西教的基督教为韩人所认同,并进而作为西方文明的化身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对此,目前韩国学界大体倾向这样的意见,即韩国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大,传教活动不具有帝国主义倾向。这显然有别于近代中国基督教挟西方列强兵锋、倚特权而推进的情况,于是后者所遭遇到的顽韧抗争也就不足为怪了。韩国学者金希教对此还作了具体分析:“韩国和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发生形式的差别是来自两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矛盾的不同,

即韩国反基督教运动低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为非基督教国家的日本试图支配韩国,韩国的统治阶层和民众把基督教国家看做韩国独立的同伴。”^{②4}他又说,“中日战争以后美国需要把朝鲜半岛作为美国在中国地位的保障。认为让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防止俄国威胁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增加美国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这却导致了韩国的民族生存危机,这种危机使得韩国民众不反对基督教,反而试图通过基督教来联合西方对抗日本,这最终导致了韩中两国反基督教运动的不同进程。”^{②5}从这一视角来对近代中韩两国的反基督教历程作出分析,金氏之言当有其可取之处。

另一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坚韧性有关。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它与以儒家思想为本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无疑是难以沟通的。我曾经指出,就基督教入华和它对中国的思想影响而言,“逮乎近代,西方列强所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饱受民族屈辱的中国人更急剧地强化了保文保种的防御意识,强化了‘卫圣道,攻异端’的信念,强化了反基督教的思想。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世代相继的文化心理,绵延了一千多年之久(从大秦景教初入唐时)的思维定势,悠远而又韧性,恒久而又顽固……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意识的传承性、持久性与线性性,要消解它吗?谈何容易,除非付出十倍的顽抗,百倍的坚韧。”^{②6}

不错,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等)提出了“孔子耶稣”的命题,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吴雷川等)从基督教本色化的角度出发,去寻找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的共通点。然而,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却始终如圆凿方枘,于是反基言词不绝,更不必说频仍发生在各地的反洋教行动了。

由此,我们又想到了佛教入华及其本土化的问题。当然这一本土化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秦家懿认为:“佛教如果不是

在文化上适应中国的环境便不能在中国一直存留到今天。文化适应促使佛教演变,并使它能够对中国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②7}他又说:“从佛教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基督教依循佛教的榜样,它可能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②8}对比佛教与基督教入华后的不同境遇,秦氏之言,似不无道理。

以上这些,与韩国的情况显示出差异,特别从宗教自身的角度讲,近世以来的韩国传统的儒教、佛教和道教等日趋式微,并拉大了与民众的距离,而基督教的福音却在坊间流传的民间教派的信仰者中间找到了“知音”,寻求到了某种共同点。总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韩民族的本土文化之间取得了某种调和,这恰恰也是基督教入韩及本色化工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由上文所论宗教的力量,人们可以悟出,宗教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将宗教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述古论今,环视世界,不由生发出几多思绪,几多联想:

其一,宗教的复杂性。

在常人看来,宗教现象或宗教所显示的力量是那样扑朔迷离,颇令世人困惑。不是吗?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是一种社会生活;它既是被压迫阶级芸芸众生寻求彼岸世界的一种精神寄托,但又是被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②9}它既是现实苦难,在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宣泄,但又是人们对这种现实的苦难一种无奈的抗争;它既有愚昧的与非理性的负面效应,但又蕴含有科学与富有理性的思辨色彩。宗教是什么?换言之,宗教所体现的力量是什么?抑或宗教的功能是什么?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斯劳克斯之谜”,古往今来,有多少宗教学家在其作品中试图寻求这个答

案。对此,笔者虽心向往之,但却力不从心。在这里,拙文以近代中韩两国的史实,就基督教对人类心灵重塑或说它所呈现的思想力量,道及宗教的这一“品格”,并由此揭示出宗教的复杂性,这也许仍是“瞎子摸象”而已。

由宗教的复杂性,需要再说到的一点是,在评估近代基督教入中韩史时,既要看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工具,有其为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国家充当文化侵略角色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基督教的引入在国人中所起的某些积极的正面效应(略如上述)。^{③④}如果一概把基督教的输入都斥之为“文化侵略”或“精神侵略”就未免失之简单与肤浅。这正是由宗教的复杂性而决定的。不过,从近年来基督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来看,此种“文化侵略”的意识已渐趋淡化。时贤曰:“宗教史是个多迷雾的领域,与百年新陈代谢纠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入华史尤多雾气,隔着雾气论史,非常容易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③⑤}此论对近代基督教入韩史的研究,我以为也是适用的。

其二,不能忽视宗教生活。

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不管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多大的演变,由于宗教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人群的宗教生活的长期性。令人瞩目的是,在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人们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结却随之在增长。说来奇妙,在很现代化的大楼或商厦里,设有佛龛的可不在少数,很摩登的现代的男女们,或求签拜佛,或祈求上帝,亦为现代世俗社会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笔者曾研究过基督教在现代中韩两国传播的问题,事实上,宗教信仰与信徒人数在现代中韩两国都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现代,它的天主教人数列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之后,居世界第四位,新教教徒至80年代就有教徒900万,占总人口24%,而学界对“东亚佛教文化圈”的研讨,既是对应马克斯·韦伯的相关命题,又是通过重新诠释,以真实超越又看重人世觉悟的价值话

语,解决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难题,故倍受世人与学人的双重关注。^{③⑥}总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能忽视宗教生活。尤其在我国新时期及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宗教生活因适应人们多元的精神需求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里,粗暴的干涉与放任自流,都是不足为训的。

其三,宗教发展的前景。

由上文说及的宗教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可以窥视宗教发展的前景。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传承显示了这种文化的特有魅力和自身的创造力,因而延续至今。可以预期,它将随历史的发展而继续生存下去。宗教的消亡也许是一个很遥远的将来,对此,我辈可置而勿论。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上来吧,在对话中,他们两人都致力于寻求一种新宗教,一种“普遍性的宗教”。池田说“与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新宗教即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③⑦}汤因比十分赞同在未来社会创立这种新宗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一新宗教“必须赋予人类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力量”,^{③⑧}或者说需要确立一种让“每个人自己直接地接触到‘终极的精神之存在’”的“高级宗教”,^{③⑨}等等。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都是以“智者”著称的,但他们对宗教未来发展趋势的见解是否也很“明智”呢,对此恐难妄加评说,还是留待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的事实来作出判断吧。●

①③④⑤以上汤因比的言论,均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三篇第二章第361—369、374、375、383页。

②参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③参见张广智:《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⑤语见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转见刘小枫主编:《道与言》,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页。

⑥[德]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3页。

⑦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3页。

⑧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关于韩国近代史的断限,姜万吉的说法是:把门户开放以前朝鲜王朝后期和从门户开放到韩日“合邦”,称之为“韩国近代史”。但学界对韩国近代史的上限仍有不同的说法:1、有论者主张韩国近代史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实学产生的18世纪;2、有论者主张始于反抗法、美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的19世纪60—70年代;3、有论者主张始于门户开放、缔结江华岛条约的1876年,等等。

⑨转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82、219、253—254页。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金得焜:《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313、313、107页。

㉞如梨花女子大学(Ehwhu Woman's University)的设立便为一显例。该女子大学的创办,完全是为了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文化水平,因而该校在现在韩国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㉟金正玄:《宗教、民族主义和国家政策:日占时期韩国基督教与神道间的冲突》,载复

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㊱此处引语见克里斯托弗·道森:《超越政治》第21页。载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又,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是公元4至5世纪时的贝拉基所创,其要旨为:强调人性本善,人有自由意志,应自愿选择苦行生活以求得灵智进步。

㊲对此,可参见朴英姬:《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㊳㊴㊵㊶㊷㊸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187、188页。

㊹㊺㊻金希教:《1905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39页。

㊼张广智:《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㊽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㊾对此,新出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可资参考,该书突破“文化侵略模式”,将传教士的入华活动置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既指出他们来华的目的是使中国西方化,又看到它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㊿见杨国强为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所写之序言,前引书。

㊱参见尚达:《东亚佛教文化圈》,《文汇报》(上海)1998年2月20日。

责任编辑:郭秀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考辨

——与陈新业先生商榷

□ 李玲崧

(佛山教育学院政史系, 广东 佛山 528000)

[关键词] 罢黜百家 董仲舒 汉书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应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而非如陈新业先生在《中国史研究》撰文所认为的“‘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绡”。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69-02

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全国，确立了儒家学说定于一尊的地位，开创了历代王朝德治主义的先河。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语主是谁，也就是说这句话最早出自何人，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董仲舒应举对策的前六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丞相卫绡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据此，陈新业先生最近在《中国史研究》发表文章认为，“‘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绡”。^①然而，细读陈先生的文章，我觉得上述看法颇有些纰漏。

其一，卫绡所奏只限于罢黜法家和纵横家，而不包括黄老、道家、阴阳家等其他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陈文说“卫绡在请求罢黜法、纵横等家的奏疏中，未敢明确地提及黄老或道家之名，实际上也是罢黜的行列。可见，‘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绡”。文献记载明明没有说

卫绡要求罢黜黄老和道家，陈文却说“实际上”黄老和道家“也是要罢黜的行列”，然而又提不出任何史实作根据。显然，“实际上”三字是不切实际的推论，实难以作为肯定卫绡已经提出罢黜黄老、道家的理由。而以这种推论为根据，得出“‘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绡”的结论，就更加没有说服力了。

其二，卫绡的奏请没有言及“独尊儒术”。陈文认为“独尊儒术”在董仲舒“干政前也已经在实际中推行”，但始终说不出“独尊儒术”是谁提出来的。我以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独尊儒术”是目的，“罢黜百家”是前提。因此，“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是不可分割的完整思想，应该是由同一个人同时提出来的，而陈文又找不到“独尊儒术”的语主，这样，“‘罢黜百家’语出卫绡”之说，也就更加难以成立了。

其三，如若如陈文所说，“罢黜百家”

是卫绾在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的奏请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而“尊崇儒术在董生干政前也已经在实际中推行”。那么在卫绾奏请之后的第六年,即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五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建议就等于放了空炮。董仲舒的建议是这样的: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②

董仲舒当时还只是一个治《春秋》的博士,“名不见经传”,他的对策又是写给汉武帝“亲览”的,要是当时真的实际上已经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就不可能在皇帝面前说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显然,在董仲舒对策前,西汉王朝不可能已经推行和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虽然把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的时间载于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五月,但他确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在《董仲舒传》中不仅记录了上述董氏提出的罢黜儒家以外诸子百家的建议,而且明确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着重点为引者所

加)。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不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出自董仲舒的对策,而且立学官、举茂材等也是由董仲舒发起的。

正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所以《资治通鉴·汉纪》改正了《汉书·武帝纪》的误笔,把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事,载于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冬十月。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更明确指出《汉书·武帝纪》把董仲舒应举对策和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等载于元光元年是错误的,并说“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无可疑”。③据此,顾颉刚认为,建元元年冬十月,董仲舒应举参与贤良对策,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建议,汉武帝听后,就“讽令”丞相卫绾奏请黜退“刑名之言”、“纵横之言”。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又进一步“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的色彩更加鲜明”。④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先是董仲舒在应举对策中提出来的,而丞相卫绾奏请罢退法家、纵横家,则是在仲舒对策之后,在汉武帝的“讽令”之下进行的。●

①陈新业:《“罢黜百家”语出何人》,《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王先谦:《汉书补注·武帝纪》。

④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5 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乐章集校注》辨误

□陈永正

(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02750)

[关键词] 乐章集 笺注 附考

[摘要] 薛瑞生撰的《乐章集校注》一书《笺注》及《附考》部分错误较多, 兹分全词考释错误、句意解释错误、词语解释错误及注释欠准确者等, 逐条辨正。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71-06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校勘精审, 注释详尽, 海内外学界均有很高的评价。近日阅读丛书中由薛瑞生校注的《乐章集校注》(1997年12月重版), 发现其《笺注》及《附考》有上百处失误, 兹择其尤者与校注者商榷。

一、全词考释错误者

1、《玉楼春》词: “昭华夜醮连清曙。金殿霓旌笼瑞雾。九枝擎烛灿繁星, 百和焚香抽翠缕。香罗荐地延真驭。万乘凝旒听秘语。卜年无用考灵龟, 从此乾坤齐历数。”“凤楼郁郁呈嘉瑞, 降圣覃恩延四裔。醮台清夜洞天严, 公宴凌晨箫鼓沸。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鹧鸪望尧云, 齐共南山呼万岁。”(第48页)

《笺注》: “真驭, 神仙。真, 真人。驭, 驭风客。”“(万乘名)天子屏息静气听着神仙对他传授仙家秘诀。”“(降圣句)降圣, 谓九天司命天尊。……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为降圣节。”《附考》: “然此

词明写汉武帝, 实写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书降……当更以作于大中祥符元年为宜。”

按: 二词当写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圣祖”降于延恩殿事, 与汉武帝无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戊午, 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八日, 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 ‘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 将见汝。’……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 ……天尊至……曰: ‘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 是赵之始祖, ……皇帝善为抚育苍生, 无怠前志。’即离坐, 乘云而去”。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 为圣祖赵玄朗之尊号。词中“真驭”, 谓圣祖仙驾; “秘语”即圣祖对真宗所说的话语。

2、《玉楼春》词: “星闾上笏金章贵。重委外台疏近侍。百常天阁旧通班, 九岁国储新上计。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对。归心怡悦酒肠宽, 不泛千钟应不醉。”(第51页)

《笺注》：“(星闈)星，星郎。闈，宫旁门。”“外台，亦即宦官。”“(近侍)近臣，亲近左右之臣。”“(天阁)《宋史》卷八《真宗纪》：‘天禧四年，丁谓等请作天章阁奉安御书。’故知天章阁为宋真宗藏书处。”“(通班)通事或通事舍人，太子官属，掌笺启及参谒之礼与劳问之事。此处盖指张武、宋昌等……后谏早立太子……张武、宋昌乃文帝为代王时之官属，正与通事舍人无异，故知此用其事耳。”“(国储)即太子。因太子为国之储君，故名。”《附考》：“‘九岁国储’，指汉景帝。……景帝被立为太子时方九岁。而文帝即位之初，即建国储，故谓‘新上计’。无独有偶，宋仁宗被立为太子时亦恰九岁……可见此词明写汉文帝，实写宋真宗。故知此词写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仁宗初被立为太子时。”

按：“星闈”，犹言皇宫。“外台”，此代指御史。“近侍”，此当指宦官。“天阁”，即尚书台。“通班”，谓通于朝班，指达官贵显者。“九岁国储”，九年的国家储备。《礼·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北史·韩麒麟传》：“古先哲王经国立政，积储九稔，谓之太平。”“上计”，地方官将户口、钱粮等计簿上报，以资考绩。此词歌颂皇帝的太平治绩，与立太子事无涉。

3、《御街行》词：“燔柴烟断星河曙。宝辇回天步。端门羽卫簇雕阑，六乐舜韶先举。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恩霈均寰宇。赤霜袍烂飘香雾。喜色成春煦。九仪三事仰天颜，八彩旋生眉宇。椿龄无尽，萝图有庆，常作乾坤主。”(第69页)

《附考》：“《全宋词》题曰‘圣寿’，并注云：‘题据毛校《乐章集》补。’然此词乃颂御楼肆赦，已详见注中，与‘圣寿’毫无关涉。毛校误，唐氏因之而失察，亦误。又，《宋史》卷八《真宗纪》载：‘(天禧)二

年(1018年)秋七月壬申，以星变赦天下’……此词或写天禧二年大赦耳。”

按：此为贺宋真宗圣寿之词。上阕写祭天后回驾颁布赦书，下阕歌颂皇帝福寿绵长。“椿龄”等皆祝寿常语。毛本与《全宋词》题“圣寿”，不误。所引星变大赦事，亦非。星变非吉兆，不当作此喜庆之词。

4、《临江仙》词：“鸣珂碎撼都门晓，旌幢拥下天人。马摇金辔破香尘。壶浆迎路，欢动帝城春。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犹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第204页)

《笺注》：“(荆王)《汉书》卷三五《刘贾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按，荆王魂梦，谓英雄之梦，建功立业之梦，非才子佳人之梦。(岭头云)有别于巫山之云，承上文，故云‘应认’。”《附考》：“此亦为投献词，其投献对象当为一刘姓而又有知扬仕履者。查《北宋经抚年表》，自宋太宗太平兴国至哲宗元祐年间，刘姓之知扬者，唯刘敞一人耳。”“此词写于刘离扬赴阙时也，当在嘉祐三年(1058年)春夏间。果否，待祥考。又，唐圭璋断柳永卒于皇祐五年(1053年)，似有误。”

按：荆王，即宋玉《高唐赋》中的楚王。沈佺期《巫山高》诗：“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李商隐《代元城吴令暗为答》诗：“荆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校注者据“荆王”一词考定投献对象及柳永卒年，全词意旨皆误。

5、《永遇乐》词中有“天阁英游”、“吴王旧国”之语(第96页)。《笺注》谓“天阁”，即“天章阁”。《附考》谓：“此词亦投献词，投献对象当为既享有天章阁官衔又有战功之苏州太守。”“符合‘天阁英游’、‘汉守分麾’者唯滕宗谅一人而已。”“《姑苏志·守令表》载滕于庆历七年

(1047年)到任,不久即卒,故知此词写于庆历七年无疑。”

按:“天阁”,指尚书台而非天章阁。校注者据“天阁”一词从20余名苏州太守中筛选出滕宗谅一人,又以此考定其写作时间,亦大误。

6、《千秋岁》词,有“福无艾,山河带砺人难老”之语。(第258页)

《笺注》:“(无艾)不足五十岁。《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附考》:“查北宋与柳永年齿相先后而入相位之吕姓者有三:吕蒙王(946—1011年)、蒙正之姪吕夷简(979—1044年)、夷简之子吕公著(1018—1089年)。然吕蒙正及艾之年时柳永尚为十岁左右之蒙童,而吕公著至及艾之年时柳永已卒,唯吕夷简与柳永年齿相当,有可能成为此词之赠主。……夷简入相时年四十四,正所谓‘福无艾,山河带砺人难老,’‘同一吕,今偏早’者是也。”

按:“无艾”,犹言“无尽”。此“艾”与《诗·大雅·庭燎》“夜未艾”之“艾”字同义,而非指五十岁。据以考证投赠对象,亦属无根。又,诸本均无此词,校注者从《古今小说》录出,似不宜径作柳永的佚词。

二、句意解释错误者

1、《曲玉管》词:“别来锦京终难偶。”(第33页)《笺注》:“意为再不会有人像苏蕙那样写回文诗寄所欢了。”按:难偶,犹言难遇。谓别后总收不到她的书信。

2、《笛家弄》词:“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第28页)《笺注》:“据《云溪友议》载:唐韦皋少时游江夏,馆于姜氏。姜氏有小青衣名玉箫,常令侍韦皋,因有情。韦归,一别七年。玉箫死后再世,仍为韦侍妾。下句‘前事难重偶’即谓此。”按:此仍用《列仙传》中秦穆公女弄玉与萧史的常典。词意谓与情人一

别,旧欢不再。

3、《满朝欢》:“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笺注》、《事文类聚》:“杜大中起于行伍,妾能词,有‘彩凤随鸦’之句,杜恕曰:‘鸦且打凤’。”《洛阳伽蓝记》:“河间王琛妓女三百人,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舞,《垄上》声。”按:“秦楼”句,用弄玉吹箫引凤的常典;“楚观”句,用巫山云雨的常典。宋玉《高唐赋》有“望高唐之观”一语,故云“楚观”。与杜大中、河间王琛全无关系。

4、《受恩深》词:“陶令轻回顾,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第39页)《笺注》:“意谓花落烟冷,陶令也会憔悴东篱,无悠然之兴。”按,此为咏菊词。谓陶渊明爱赏菊花,免使它在东篱烟雨中独自憔悴。

5、《木兰花》词:“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衬步。”(第140页)《笺注》:“谓美女语声从如花般绣扇中传出,舞步如云衬般轻妙。喻扇之艳,舞之妙,人之美。”按:上句谓女子以绣扇掩口而歌,下句谓茵褥如云,衬托着她的舞步。

6、《过涧歇近》词:“小阁香炭成煤。”(第162页)《笺注》:“熏炉中的香与暖炉中的炭已烧成了烟尘。煤,烟尘凝结物。”按:香炭,以香料制的炭。南朝梁吴均《行路难》诗:“金炉香炭已成灰。”

7、《女冠子》词:“别馆清闲,避炎蒸、岂须河朔。”(第207页)《笺注》:“河朔,谓黄河以北之地。《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振河朔,名重天下。”按:此用夏日避暑之常典。《初学记》卷三引曹丕《典论》,谓刘松在河朔,“常以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饮。”

8、《塞孤》词:“遥指白玉京,望断黄

金阙。远道何时行彻。”(第 227 页)《笺注》：“(白玉京、黄金阙)皆仙人所居之府。……此处均借指所欢美人之居。”按：此为离别行役之词，玉京金阙，借指京城，与美人无涉。

9、《倾杯乐》词：“算伊别来无绪，翠消红减，双带长抛掷。”(第 243 页)《笺注》：“(双带)《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此句从行人落笔，故云。”按：双带，此为女子之眼，非写行人。

10、《千秋岁》词：“朝堂耆硕辅，樽俎英雄表。”(第 258 页)《笺注》：“(耆硕辅)谓宰相。《礼记·曲记上》：“六十曰耆。”硕，大。辅，宰辅，辅臣。(樽俎)樽，酒器。俎，礼器。此处谓庙堂，与上句‘朝堂’对文。”按：耆硕，指高年有硕德者。辅，辅佐。动词。樽俎，樽以盛酒，俎以盛肉。代指宴席。此用折冲樽俎之常典。谓不用武力而在宴席谈笑中折服敌人。

三、词语注释错误

此类错误在《乐章集校注》中颇多，略举数例如下。

1、《早梅芳》词(第 7 页)“汉元侯”注：“指三国时魏将张既。”按：当指东汉元侯邓禹。

2、《倾杯乐》词(第 25 页)“会乐府两籍神仙”注：“两籍神仙，指太一、后土。”按：籍，指乐籍。神仙、喻乐妓。又，“梨园四部弦管”注：“即指金石丝竹四类乐器。”按：此指宋朝教坊四部，即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

3、《定风波》词(第 63 页)“箭波”注：“柳叶映地之影。柳叶如箭，故云。”按：此谓如箭疾的流波。

4、《佳人醉》词(第 67 页)“书帷”注：“书房。”按：书帷，书室中的帘帷。

5、《巫山一段云》词(第 75 页)“九班

麟稳破非烟”注：“九班，本指朝班，此指仙女舞班。”“麟，即麟步，麒麟之步。所谓‘龙申、凤舞、鸾歌、麟步’者。麟稳，麟步稳称，舞姿轻妙。”按：九班，指仙班。麟，仙人以麟为驾。麟稳，谓麟驾安稳。

6、《巫山一段云》词(第 78 页)“令赉瑶检降彤霞”注：“彤霞，盖指‘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按：彤霞，红霞。降彤霞，谓仙人乘红霞而降临。

7、《永遇乐》词(第 94 页)“藩侯”注：“藩侯，出于斯拉夫语，意为领主。”按：藩侯，指藩王。中国古代即有此语，与斯拉夫语无涉。又，“竞歌元首”注：“元首，天子。”按：歌元首，语出《书·益稷》：“乃歌曰：服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8、《永遇乐》词(第 96 页)“槐府登贤”注引《梦溪笔谈》：“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按：槐府，三公之署，古以三槐九棘，定三公九卿之位。又，“孙阁长开”注引元稹《戏赠乐天复言》：“孙园虎寺随宜看，不必遥遥羨镜湖。”唐陆广微《吴地记》：“通玄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按：孙阁，用《汉书》公孙弘开东阁的常典。

9、《应天长》词(第 130 页)“碧砌”注：“碧砌，碧瓦层叠的华屋。”按：碧砌，碧石台阶。

10、《少年游》词(第 132 页)“归云一去无踪迹”注：“归云，以仙人驾云归去喻与其分别的美女。”按：归云，犹言云归，云逝。与仙人无涉。

11、《少年游》词(第 135 页)《河传》词(第 213 页)“舞裯”注：“舞衣。裯，近身衣。”按：舞裯，歌舞用之裯席、褥子。

12、《长相思》词(第 138 页)“风传银箭，露透金茎”注：“露透，露气很盛。”按：露透，犹言露沾、露满。透，作动词用。

13、《郭郎儿近》词(第 215 页)“砚

席”注：“即砚池。砚中储墨之池。”按：指砚台与坐席。

14、《临江仙引》词(第 222 页)“停飞盖促离宴”，注：“飞盖，即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按：飞盖，指急行如飞之车。盖，车篷。

15、《宣清》词(第 117 页)《倾杯乐》词(第 243 页)有“散尽高阳”、“高阳客”之语，注皆引巫山云雨之典，谓“高阳客”为“梦见朝云之楚王”。按，高阳，用《史记·酈生传》高阳酒徒之常典。

16、《倾杯乐》词(第 243 页)“酒心花态”注：“酒心，未详。盖谓醉心于恋情也。”按：酒心花杰，犹《祭天神》词“酒杰花情”。

17、《夏云峰》词(第 102 页)“楚台风快”注：“楚台，凡歌舞之所多称楚馆秦楼或楚台歌榭。”按，句意本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

18、《少年游》(第 138 页)“当日偶情深”注：“偶情，不期而遇之情。”按：偶情，两情。

19、《长相思》词(第 138 页)“严城”注：“秋冬之城。以其时严冷肃杀，故云。”按：严城，指戒备森严的城池。

20、《木兰花》词(第 141 页)“管烈弦焦争可逐”，注引《后汉书·蔡邕传》载“焦尾琴”之典。按：“烈”与“焦”，均为形容管弦之声，与焦尾琴无涉。

21、《望远行》词(第 150 页)“金阶铺藓”注：“金阶，有金饰之楼梯。李白《别内赴征三首》：“翡翠为楼金作梯。”按：金阶，台阶的美称。

22、《轮台子》词(第 164 页)“干名利禄”注：“求名，求利，求禄。干，干进。”按：《礼·表记》“利禄”郑注：“利禄，言为

贪禄留也。”利，动词。

23、《洞仙歌》词(第 190 页)“淑气散幽香，满蕙兰汀渚”注：“满蕙兰汀渚，即蕙兰满汀渚。”按：满，指香满，下句紧承上句。

24、《望远行》词(第 192 页)“须信幽兰歌断，彤云收尽，别有瑶台琼榭”注：“幽兰，即春兰。彤云，红云，亦即夏云。皆失其时，故云‘歌断’、‘收尽’。”按：幽兰，古琴曲名。宋玉《讽赋》：“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谢惠连《雪赋》：“楚谣以幽兰俪曲。”彤云，阴云。此为咏雪词，数语写雪后之景。

25、《女冠子》词(第 206 页)“飘薄”注：“飘薄，薄飘之倒置。”按：飘薄，同“飘泊”。随风消散。

26、《西施》词(第 212 页)“尽让美琼娥，千娇百媚”注：“琼娥，即嫦娥。传说月中有琼楼玉宇，故云。”按：琼娥，犹言玉娥、玉人。称美女。

27、《金蕉叶》词(第 55 页)“金蕉叶泛金波齐”注：“齐，音义均同‘跻’，涌也。”按：齐，平也。金波齐，谓金波酒与杯平。

28、《浪淘沙令》词(第 103 页)“促拍尽随红袖举”注：“促拍，佐酒之乐。”按：促拍，节拍急促之乐，宋词中常用语。词调有《促拍满路花》、《促拍采桑子》等。

四、注释欠准确者

1、《黄莺儿》词(第 1 页)“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注：“谓饰以金缕之舞衣也。”按：缕金衣，形容黄鹂之毛羽。

2、《早梅芳》词(第 7 页)“万井”注：“意谓地域辽阔，街市格局如井田形整饬有序。”“万井为平方百里。”按：古制八家为井，万井犹言千家万户。

3、《尉迟杯》词(第 64 页)“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注引《庄

子》积石琼枝及《晋书·谢玄传》芝兰玉树之典,谓“以琼枝比娇贵女子”,“以玉树喻彦才”。按:琼枝玉树,词中以喻男女之裸体。

4、《秋蕊香引》(第 90 页)“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注:“冥路,空远黑暗之路。”按:三句犹《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意。

5、《破阵乐》词(第 107 页)“雁齿”注:“犹云雁行,以喻物之并列整齐。”按:指桥之台阶。

6、《双声子》词(第 109 页)“姑苏台榭……唯闻麋鹿呦呦。”注:呦呦,鹿叫声。《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按:此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子胥谏吴王语:“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

7、《夜半乐》词(第 156 页)“酒旆”注:“以杂色翅尾饰的酒旗。《释名》:‘杂帛为旆’。”按:酒旆,即酒旗、酒帘。非专指杂色翅尾者。

8、《遏涧歌近》词(第 158 页)“畏景”注:“夏日之景。”按:畏景,犹言“畏日”,指夏日、烈日。又“水边石上,幸有散发披襟处”注:“散发披襟,乱发袒胸,指挂冠隐居者。”按:散发披襟,谓逍遥自在,舒畅怀抱。

9、《玉胡蝶》词(第 181 页)“十二金钗”注引《拾遗记》、《南史·周盘龙传》。不切。按,当引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头上金钗十二行”及白居易《酬思黯戏赠》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

10、《透碧霄》词(第 216 页)“钧天”注:《汉武帝内传》:“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按:钧天,用钧天广

乐之常典。

11、《木兰花慢》词(第 220 页)“凝旒”注:“以丝绳穿玉垂冕前后曰旒,即今之所谓流苏、飘带。”按:凝旒,谓皇帝专心聆听,冕旒不动。《旧唐书·刘洎传》:“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

12、《瑞鹧鸪》词(第 229 页)“绛雪纷纷落翠苔”注:“绛雪,丹名。《汉武内传》:‘仙家上药,有玄霜,绛雪。’”按:绛雪,喻红色的花,与丹无涉。

13、《长寿乐》词(第 234 页)“愿长绳且把飞鸟系”注:“传说太阳中有三足鸟,故云。”按:此本傅休《九曲歌》:“安得长绳系白日。”

14、《倾杯》词(第 236 页)“最苦碧云信断,仙乡路杳,归雁难倩”。注引江淹“日暮碧云合”语,谓“因系拟沙门惠休作,故后世多用‘碧云’为别僧之语。此处谓‘仙人’,即词中所思之人。”按:此词无别僧之意。词中谓“仙乡”,非“仙人”,指所思居处。

五、注释地名、人名过于坐实者

如注:“鸳鸯浦,在慈利县北”(第 15 页)、“关河,指幽谷关与黄河”(第 33 页)、“香径,即采香径”(第 89 页)、“断桥,桥名,在西湖上”(第 121 页)“沧江,即沧浪水。”(第 230 页)本皆为泛指,不必坐实。又如《传花枝》词:“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第 58 页)注引《西京赋》、《文选》、《汉书》、《北山移文》、《述书赋》,谓张陈赵或指张回、赵放,或指张子罗、赵君都,或指张敞、赵广汉,或指陈闳、赵微明。按:张陈赵,犹言“赵钱孙”,罗列姓氏而已。●

责任编辑:陶原珂

面向 21 世纪的比较文艺学

——访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

□ 李凤亮

(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比较文艺学 世纪之交 学科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77-04

李: 饶教授, 当前面临着又一个世纪之交, 思想界正致力于回顾本世纪学术研究的历程,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在这一总体背景中, 有关中国文论建设现代化的反思也日益受到关注。有效的建设应该建立在这种认真反思与清理的基础之上, 因此,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走过的历程颇值得好好总结。不知您是如何看待 20 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轨迹的?

饶: 20 世纪即将走过。在这 100 年间, 各种思潮、理论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竞相登场, 使得这 100 年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理论的世纪”、“批评的世纪”。从总体上看, 本世纪的头 20 年与末 20 年在文化思想上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它们具有这样一些相似之处: 都处在文化的转型期, 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文化背景下, 处在中西异质文化的相遇、碰撞(冲突)和抉择之中; 在思维上都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当然, 本世纪的头 20 年和末 20 年毕竟是不同的, 它们联系着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纪之交。面向 21 世纪时, 我们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 如何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并在这一基础上找回那些被忽

略的优秀传统, 科学地对待引进的西方文论, 在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上寻找、明确中国文学的走向, 应是我们面对 21 世纪时必须着手做和把它做好的工作。

李: 建国以来文艺学学科的建设, 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今天的角度看, 共和国 50 年的文艺学学科建设显示了哪些特色呢?

饶: “文艺学”就是“文学学”, 是研究文学的科学, 实际上等同于西方古典文论家所讲的“诗学”。我们过去的文艺学, 从体系、框架到理论内涵, 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50 年代的文艺学教学, 使用的是前苏联文艺学家季莫菲耶夫编写的教材, 这套教材共三本: 《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的构成》和《文学发展过程》, 其问题是没能联系中国的实际。60 年代, 周扬组织编写高校文科教材, 之后, 出版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文艺学教材虽然总体上仍未跳出前苏联文艺学的框架, 但已注意到如何结合、联系中国的实际, 也引用了一些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料和话语。这两本教材被各大学广泛使

用,影响较大。80年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思想、美学与文艺理论的交流日多,各种理论、不同学科之间交互共生,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出现的著作很多,而且各具特色;文艺学的教材也走向多维、多样,还出现了如文艺心理学、文艺伦理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文艺语言学、文艺人类学、文艺文体学等跨学科的成果,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出现的一个新特点。

李:饶教授,我注意到您经常从文艺学建设的角度谈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有何重要进展,有些什么特色,还存在哪些问题,能否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饶:近20年来,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推进较大,对古代文论中重要的观念、范畴,如“自然”、“意境”、“意象”、“神思”、“比兴”等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有关中国文论体系的宏观探索与理论归纳也取得一定进展;这些都反映出学界对本民族诗学源流的关注和重视。当然,中国传统文论独具特色,是在与西方文论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孕育出来的。由于中西文论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原体,在言说文艺如何存在的方式上,也很不相同。所以,如何进一步梳理、建构一种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还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本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里所使用的诗学话语,都是西化的,并非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在未来的21世纪,中西方学者如何通力合作,共同建构一种更具东西方共性的诗学话语和理论,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诗学理想。探索民族特色和具有世界视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并不矛盾。世界诗学话语的建构,离不开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不仅仅是求同,也要识异,既要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论中与西方相通的规律性的东西,也要认识那些不同于他国文论的东西。如果民族的“差异”能丰富世界的诗学体系,那就应该整合进去,这样,世界的诗学体系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加强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并努力探讨和实现其现

代转换,它的更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从您刚才的谈话中,我感到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反思与清理至少可以在这样几个层面展开:一是如何有效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换;二是探讨中国文论如何有效地融入世界的诗学体系建设;三是考虑文化整合趋势如何真正在文论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能否请您结合当前的现状,谈谈对下一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看法?

饶:对于如何开展文论建设,近年来文艺学界不少学者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如何整理中国传统文论,使之有效转化从而达到“古为今用”,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方面,在怎样吸取域外文论的养料以实现“洋为中用”,并突破几十年来文艺学体系的局限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尤其是最近,人们在清理本世纪文论历程、总结“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之际,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等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都将有助于今后更为理智地开展文论的建设。至于如何开展好下一世纪的文论研究、学术研究,这不是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应予以进一步重视:第一,应有世界眼光,即要有世界性的诗学立场。中国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一部分,我们研究中国文论,不能只是“独白”,而应跟世界“对话”,同时要结合创作实践,研究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影响、贡献,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国文论,应面向世界。第二,要重视文论与文化的结合与联系。当前,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论更应重视其文化背景,同时也要注意文论中文化的投射,认识文论中的文化质素。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要作历史考察,把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辩证的分析。因为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回避的问题。

对文论的意识形态化与非意识形态化,都要有科学的分析与甄别。建国以来,在现实主义的讨论、艺术典型的探讨、形象思维的研究、艺术“工具论”的批判、艺术真实论的再认识等方面,学者们发表了许多见解。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对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研究虽多,但真正从学理层面切入的探讨仍亟待加强。第三,要重视多元文化的比照和交叉学科的投射。当前,文学研究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和多学科投射,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学科之中进行比照和阐释。现在世界上许多文化的转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第四,要更多地关注当下的文学问题。当前文学界可谓丰富复杂,扑朔迷离。作为文论研究者,要去面对,去研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还要引进新的方法,把文学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论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李:一个学科的发展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同其有无新的学术生长点关系密切。由您领衔的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在国内同专业中首先确立“比较文艺学”这一研究方向,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学术探索。在您看来,比较文艺学研究对构建中国当代文论有何积极作用?世纪之交,这一学科如何才能得到进一步拓展?

饶:比较诗学研究是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种共同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倡导的比较文艺学是比较文学与文艺学“联姻”的产物,是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应用于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尝试。我们确立的“比较文艺学”方向,旨在超越传统文学理论内在的区域性限制和学科界线,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实现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寻找重建现代文艺学体系的基础和条件,它是文艺学学科适应世界格局一体化要求而进行自我更新与现代转型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着眼于 21 世纪文艺理论建设所提出的研究方向。我们

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对目前诗学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中国诗学根基的有意识的寻找。

五年多来,我们在博士点的建设和教学中,努力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展开和把握这一总体方向:一是中西文艺理论比较研究;二是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比较研究;三是文学理论与其他人文学科及宗教学说的比较研究;四是比较文艺学一般总体性问题的研究;五是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研究。我们力图通过方法论上的突破而在多维度比较视野中拓展文艺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眼光,跳出过去各种“中心论”为主的文艺学体系,为当代中国的文论建设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因此,中西诗学比较是我们着力加以研究的方面,而世界性诗学立场的确立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上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观念、原理,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这一领域基本上被“欧洲中心论”统治着。如今人们越来越感到在文化发展上要摆脱原先的局限,必须重视文化的外求和横向的拓展。文艺学学者如何从本学科的现实出发,建立新视野,以开放的态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诗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欧洲中心式”的阐释,认识、探讨各类不同文化框架中的普遍文学现象,建立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应该成为我们迈向 21 世纪时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至为重要的是能够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这将是今后需要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中西异质文化彼此都难以摆脱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因此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但中西文论都是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含有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同性,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从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文论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我们的工作,正是要在对中国古代文

论的诸多范畴、概念进行“还原”的基础上,以当代话语进行新的解读,再将其同西方文论加以比照,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在寻找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认识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论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当然,对两种“异质”、“异源”的文论进行比较,要相互沟通、理解很不容易,这就一定要有“对话”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互证互对,互比互识,在比较中看中西文论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达到中西诗学的互阐与互补。这也正是我们开展“比较文艺学”研究的初衷所在吧。

李:饶教授,您刚才一再提到通过种种比较,实现诗学研究的跨越和交互共生。据我所知,不论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还是研究生的教学,您和所在的学术群体都十分注重方法的运用与训练。文本细读与诗学提升的统一、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的融合、点的深入与面的拓展的互补,在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中一直受到重视。方法论的选择与更新已成为世纪学者拓展学术研究的一种共同而自觉的追求。这一探索与更新究竟有何重要意义?面向新世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人又应如何培养自己的方法论意识呢?

饶:你提到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且极为重要的问题。方法论是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必不可少的准备。方法对头了,研究才可能找到“入口”和“出路”,才能做到事半功倍,不断积累学术成果。同时,方法又不仅仅是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新的研究观念的诞生;反之,新的观念、理论的提出,也总是伴随着新的方法论的运用。由此可见,方法论问题十分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学者研究的品位和价值。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方法论的掌握,应该立足于学术的创新。方法论又不是可以凭空掌握的。研究某个问题,首先要将与之相关的问题搞清楚。任何文本都有其

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土壤,研究者要把文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与此同时,还要把握历史上人们对文本的不同见解和阐释,以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史。除了上述“史”的观念外,“论”的意识也应重视,即要善于发现问题,要有“问题意识”,讲究推陈出新。对各种各样的材料,既要“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做材料的俘虏,这样,学术研究才可能产生价值。

在研究策略上,我提倡在把握总体格局的前提下,更多地从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着手开展研究和发展理论,也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研究立场上,要强调对本土诗学的发掘,因为现有的文艺学体系尚未将中国的传统文论整合于其中,不能算是有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6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不断提到这些问题,但只是在理论范例上予以重视,未能在体系和气脉上加以接通。在发掘和整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还原”和“比照”——前者是指还原范畴在历代理论典籍中的本意,因此,一方面要对本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又要能够用现代汉语准确进行破译和阐释;后者是说以西方相应的理论来加以对比和参照,这就要求既对西方文论有足够了解,又要在方法上进行有效的对比,不同学科进行比较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不同学科之间要跨越,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的专业领域也要交融。近20年来,我的研究领域从文艺学延伸到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再向比较文艺学拓展,就是在努力追求这种学术研究的跨越。能否真正做到“跨越”,当然跟知识与方法上的准备有关,但首先要有这种宏观观念,这种学术追求。因为只有实现真正的“跨越”,才能跳出封闭的“小我”,具备全球性的眼界,最终达到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的浑然交融。在下一世纪的文艺学研究中,研究者的这种跨越姿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旧词语

□王吉辉

(南开大学中文系讲师,天津 30000)

[关键词]旧词语 古词语 词典

[摘要]“旧词语”是现代汉语中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词语,与古代汉语中已不为今天现代汉语所采用的“历史词语”有别。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旧词语”产生的上线。“旧词语”的产生,自有其历史变迁与文化变异的原因。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8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前言”部分,在谈及该词典收词时首次使用了“旧词语”：“一般语汇之外,也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语、旧意义,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

“旧词语”与“古词语”相对,彼此在内容上并不互为包含。至于戚雨村等编《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把“旧词语”用于统称“历史词语”“古词语”,“指在现代语言中已很少使用的词语”。这就与通常意义上的“旧词语”名同而实异了。目前,尽管“旧词语”已被用于一些词典的编纂实践,然而从理论上对“旧词语”作出分析研究的专门文章还没见到,这既不利于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一术语,又不利于形成对旧词语所指这一现象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希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旧词语”作一全面的分析,期望能抛砖

引玉。

一

为了确定旧词语的性质,我们先看看与旧词语相类似的古词语和新词语性质的界定途径。

古词语产生于文言文和古代白话作品。文言文脱离所在时代的口语,书面色彩浓烈;古代白话作品的语体色彩较之于文言文虽稍具口语特点,但与现代白话文相比,作品的书面味道仍然相当浓。这样,源自文言文或古代白话作品的一些词语使用于现代作品时,就显出了它们色彩上的书面特点,书面色彩是古词语特点的重要方面。此外,由于文言文和古代白话作品表现出不同于现代白话文的诸多特点。“与现代汉语词语比较,古代汉语词语多以单音节为主;词义表达精练;词与词之间的构成方式简单、独特”。所以,“源于古代汉语词语的古词语,被用于现代汉语中时,因古代汉语独具特点的影响,从而给人们语感上

造成一种文绉绉的、古色古香的感觉——‘古代’的背景色彩”。①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就能清楚地了解古词语的性质特征，古词语借此而可与相邻概念区分开来。

古词语性质的判断主要结合词语所依存的作品对词语的作用及影响来分析，但由于旧词语所依附的作品不具备古词语所依附作品的特殊性，对它的性质的确定无法从这个方面取得突破。

据一般理解，新词语的重要特质在于“新”，紧紧围绕着“新”来做文章大体可最终确定出新词语。②在现今编辑的各类新词语词典中，无一不强调所收成员的时间限制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紧扣住“新”来确定新词语的做法，对旧词语性质的确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换言之，旧词语性质的确定亦可以以“旧”作为切入点。

要准确地把握旧词语中的“旧”的含义，指出它在时间上的具体特征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汉语词典》“序言”即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用“不久以前还使用”来给以限定。刘叔新先生在其《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也提到了“旧词语”，并分别用“现代早些时候”（第63页）、“有较长的历史，现代前些时期”（第250页）作了时间上的限定。

确定旧词语的上限时间，必须能与古词语的下限时间大体挂起钩来，至少理论上该是如此，否则，在古词语与旧词语之间就会出现时间段的空白。同时，由于产生古词语的文言文、古代白话作品是在受到提倡“白话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下变得萎靡不振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文言文、古代白话作品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时间大体成

了古词语与新词语理论上的分水岭。刘叔新先生给旧词语划定的“现代前些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给定的“不久以前”，在我们看来可以具体落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指出旧词语的上限时间只是一方面，照例尚须确定出它的下限时间。但旧词语的不间断产生（即使在当代社会也如此，具体内容详下）使得旧词语的下限时间的确定实际上变得没有意义和毫无必要。

旧词语中反映出的事物现象不是已不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就是因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符合当代的社会风尚或新时代的精神，总之，其内容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对象、特殊观念或特别情感。当我们间或地从较早些时代的文学作品、影视广播中接触到它们时会油然而生出一种生疏感。例如：

1、房子并不整齐，不过他们还勉强能雇着一个老妈子，给他们做饭洗衣裳（林语堂《京华烟云》）。

2、你听我的，少爷回来之后，抓住他（同上）。

3、穿洋服把背心上最下一个扣子敞开，是应当如此（同上）。

4、官方发出拘票找几个关键人物和证人（林语堂《红牡丹》）。

5、女掌柜看到她，走下柜头（同上）。

6、英国人的通译不在，两个人谈话就暂停下来（同上）。

不过，光凭这内容上和使用上形成的生疏感显然还不能有效地确定出全部的旧词语，因为古词语在这些方面与旧词语表现得毫无二致。比如，有生疏感（有些甚至更为生疏）的“宦官、太监、行院、号房、科举、九品中正制”等，却一般没有被看作旧词语，它们大多被当成古词语中的历史词语。③

因此,只有将时间因素与内容上的特点、使用上的特点结合起来方可对旧词语作出符合社会实际的判断。比如,古词语、旧词语虽然都给人以生疏感,但运用于五四及以后的词语,像上面举例过的“老妈子、少爷、洋服、伙计、拘票、掌框、通译”等明显有别于古词语带给人的生疏感。这主要因为负载这些词语的影视广播及文学作品都是用现代白话文完成的,而且结构上亦表现出与当代词语一致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在这些词语中的事物现象距今并不太遥远,使得社会觉得这些词语离我们也不太遥远,对它们有一种潜在的认同感。

一个词语确如上面所描述的,它就是旧词语。“有较长的历史,在现代前些时期还流行,可是由于不适合于社会现今的思想观念和风尚,现在极少使用或一般不使用的词语,是旧词语”。④“之所以称它们‘旧词语’,就因为本是现代存在过的,不同于古代消亡了的词语”。

⑤

从以上可以看出,旧词语之所以“旧”和之所以会“旧”,绝不纯是时间因素在起作用,它还与人们对该词语的使用情况、该词语内容上的特点有密切联系。对五四以后出现的词语是否成为旧词语,相当大程度上只要依凭内容和使用的特点即可作出判断,无须时间因素的介入,因为它们根本不会与古词语发生混淆,譬如“红小兵、红卫兵”等“文革”词语。再如,我国近一段时间在度量衡方面由于向国际标准化靠拢而被废弃的传统单位像“里、丈、尺、寸、石、斤、两、钱、分、顷、亩、斗、升”等。亦只须据其内容和使用的情况而可认定它们是旧词语(虽然还没有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消失,但从发展趋势上理该如此)。

在现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时期、“文

革”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今天看来属于旧词语的单位,形成了旧词语的两大高峰。来源于前者的如“大兵、大班、大员、当差、当铺、店家、赌局、袍哥、跑堂、挑夫、听差、推事、跟脚、号外,红盘、华工、会馆、火夫、检场、脚夫、接线生、金圆券、马店、民团、丘八、人力车、帐房、邮差”等;“文革”中的词语如“红小兵、红卫兵、红宝书、红孩子、红一片、红代会、红革会、红后代、红五类、走资派、批斗、陪斗、斗私批修、牛棚、文攻武卫、忠字舞、黑材料、黑干将、黑五类、黑旗、黑话、黑会、黑纲领”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决非偶然。五四运动时期是社会处于剧烈变革和迅速发展的年代,应时而产生的词语大量出现,前此流行的词语会因为社会的变革而很少再为人们使用,甚至被摒弃;“文革”时期出现的大量词语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事物现象,它们因为随后党中央工作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很少再被人们提起。

旧词语与词语的旧义不同。若只是词语的某个或某些意义反映了旧事物、旧现象、旧观念,而所在词语的其他意义还是现今社会使用着的主要意义,如“书记”的a义(书记:a党、团等各级组织中的主要负责人。b旧时称办理文书及缮写工作的人员)、“先生”的a、b、d诸义(先生:a老师。b对知识分子的称呼。c旧时称别人的丈夫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d<方>医生。e旧时称管帐的人。f旧时称以说书、相面、算卦、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等。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它们是旧词语。为了与现今经常使用着的意义区分开,词语中反映了旧事物、旧现象、旧观念的意义是词语的旧义。

旧词语在语体色彩上并未形成如古词语那样集中而鲜明的特点——浓烈的书面色彩。书面上使用的如“哀的美敦

书、通译、泰西、台甫、台端”等和口语中流行的如“人力车、跑江湖、毛子、扛大个儿、局子、童养媳、戏班、袁大头、洋人”等,都因为符合旧词语的形成条件而成为了旧词语。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词语颇多共同之处,在色彩上杂陈不一,既有书面色彩的如“吸纳、禁核、解冻、地球村、CT”等,又有色彩中性或口语的如“独资、快餐、改革、承包、经商、个体户、卡拉OK”等。

二

旧词语虽然有别于现今使用着的一般词语,但因其存在于现代的前期,年龄较大的人曾经用过,现在也还会时常用到,而且,运用了旧词语的报刊、著作和影视作品等还较易为当今社会各层次的人们接触到。因而旧词语仍然应归为现代汉语词汇。鉴于它们大多只为后人了解却很少或不再为后人提起、运用,所以,它们又只能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缺乏活力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是行将“死”去的部分。

比较有意思的是,旧词语中有一些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重新活跃起来,比如“大户、大亨、当铺、倒闭、妓女、交易所、股票、甩卖、夜总会、老板、商号、名片、书屋”等。这是一种旧词语的回归。

旧词语在回归之后,一部分在内容上与先前相比没发生什么变化,仍然保留了存在过的意义内涵。一些旧事物、旧现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有的旧观念也会为人们认可,这样,标示它们的旧词语随之又甦生。典当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使得随之而来的一大批词如“当、当铺、当票、当头、典当”等流行了起来;勤劳致富合法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确立,为与之相关的词语如“老板、老板娘、发财、恭喜发财、招财进宝”等重被人们

运用提供了前提。其它方面的还有“破产、倒闭、股票、证券、股民、股东、分红”等亦都如此。

另一些旧词语在社会重新起用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原先的意义,并以这改变了的意义作为该词语流行于当今社会的基础。“黑店”原指“杀人劫货的客店”,“文革”中喻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现则指“从事违法商业活动的场所”。“清道夫”:“旧社会称打扫街道的工人”,现在时常用以喻指“足球比赛中担当防守的队员”。

旧词语由第二种方式回归后,因为出现了与其本来意义不同的内容,应不再被看作旧词语。回归方式的前一种情况,旧词语虽然自身的意义没有变化,但它们从此成为现代社会当中的“活”的成分,成为全民现行的共同交际工具,也应给它们摘掉“旧”的帽子。

三

词语变旧的方法、途径等,不同词语的情况存在差异。归纳起来,以下几种情形较为常见。

1、自然消亡

词语反映的客观事物现象已经消亡,不为或很少为现今的人们想起或者谈论起,由此,反映了这些事物现象的词语亦随之远离现今社会,成为旧词语。例如“袍哥、毫了、金圆券、承佃、大老婆、租界、巡捕、袁大头、元宝、红小兵、走资派”等。

旧观念下出现的词如“下人”等,因为社会观念的根本改变而基本不会再被提及,于是也只保留在特定的社会阶段而成为旧词语中的一部分。

2、替代法

词语反映的事物现象没有消失,仍为当今的人们所熟悉。然而,由于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的原因,以前存在着的

反映某事物现象的词语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被新出现的也表示这相同事物现象的词语替代了下来。这些被替代的部分终因不符合变化了的时代精神,被迫渐渐地退入旧词语之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给人们以巨大影响,使得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可是,早先存在的一些词语体现了旧观念,不能很好地准确地反映出新社会下的具体情况,因而社会纷纷另造词语加以取代。例如,“戏子”是旧社会当中对艺人的称呼,含有不尊重对方的轻视义,而这样的称呼明显有违新社会平等的人际关系特点,不宜采用,于是选用“演员”来代替。类似的例子如:

邮差——邮递员 农夫——农民
火夫——厨师 车夫——拉车的
狱吏——监狱长 清道夫——清洁工
伺应生——服务员 屠夫——杀猪的
丘八、大兵——战士

旧中国时,民族工业极度落后,大量日用消费品依仗从国外输入或靠外国人制造,因而当时许多这方面的商品都冠以“洋”字,如“洋布、洋火、洋纱、洋油”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依靠自力更生的力量已完全能独立制造这些产品,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社会后来不用“洋火”而用“火柴”,不用“洋油”而用“煤油”,不用“洋纱、洋布”而直接称为“纱、布”等。

3、遴选法

从同一时间段内标记某一共同事物现象的几个词语中选择出为社会广泛运用的一个,使之最终成为战胜者。被战胜的其它词语失去了社会运用的机会而成为旧词语。

A、由于缺少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来负责音译词的审定,音译词的翻译往往从首译者。由于各人采用的定名原

则、翻译方法、意义领悟等不尽相同,遣词用字的习惯有异,再加上行业习惯和地域口音的因素,所以所定出的译名多半存在较严重的不统一现象。

a. 音译词、意译词并存,如:

Esperanto——爱斯不难读、世界语
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
Uitimatum——哀的美敦、最后通牒
dictator——狄克推多、独裁者
science——赛因斯、科学
democracy——德谟克拉西、民主
husband——黑漆板凳、丈夫
stick——司的构、拐杖

b. 几个音译词并存,如:

golf——高尔夫球、高尔福、果尔夫
pence——便士、本土、辨士
beer——啤酒、皮酒
flannel——法兰绒、佛兰绒

c. 几个意译词并存,如:

morpheme——语素、词素、形素
stealthy target——隐形目标、隐身目

标

uncertainty——不确定度、不定度
on——通、开

B、同一原式起始的缩略形式可能会有多种情况对应着,如:

邮政编码——邮编、邮码
儿媳妇——儿媳、儿妇

C、其它各种类型的等义词语,如:

演讲——讲演 感情——情感
代替——替代
呼朋引类——引类呼朋

披星戴月——戴星披月

D、一些对同一事物现象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示的几个同义近义词语,如:

轮船——火轮——火轮船
停表——马表 私娼——暗娼
老妈子——保姆⑥ 店员——营业员
戏本——剧本 官话——普通话

幼稚园——幼儿园

一个概念用多个词语来对应,增加了人们学习、记忆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无障碍交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自我消肿”——经意地或不经意地遴选出某一个或某几个来作为社会通行的“正宗”。汉人崇尚意译词,遇音译词、意译词并存而须从中作出选择时,多选择意译词,像a组中的“世界语、维生素、最后通牒、科学、民主、丈夫、拐杖”等。⑦

社会选取并存的几个音译词中的哪一个来通用,一般地都依据社会使用习惯。不过,选用作记录的汉字本身的表意性状况或联想作用也在里面起着一定的作用。b类中,取“啤酒、法兰绒”而摈弃“皮酒、佛兰绒”,不能说与“啤”(提示与“嘴”有关)、“法”(让人联想起“法国”)的这些表意联想作用没有丝毫关系。至于该字记音准确与否倒并不是第一位的。

对于并存的意译词,社会更关心的是意译是否准确。意译准确的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能在社会中通行开来。如若是从国外引入的科学术语,那就更应该如此,如c类中的“语素、词素、隐形目标、不确定度”等。on则更为典型。它译为“开”,这“开”的意义早已为大家熟知,但在电子学术语的审定中,认为其含义不明确。“开”是指电路的开通还是指电路的打开并不十分清楚——而这两种意义的理解正好相反,因而将on定为“通”。

B类中的哪一种缩略形式能符合社会口味而在社会流行,大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说。⑧但有的似乎与不同的缩略方式有关。“邮编、邮码”的使用开始时几

乎不分伯仲,但现在,前者已占绝对上风。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邮编”采用了汉语中惯常使用的择取各词中的第一个语素缩略而成的办法。

C类里的等义词是词汇规范的对象,只需从中选出一个备用即可。至于选出哪一个备用,需做专门研究,但有两个因素无疑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社会通用的程度、范围;社会使用的习惯等。

同义词语照理是词汇中应予以保留的部分,然而或者因为社会使用习惯的缘故而选取了“暗娼、幼儿园、普通话”;或者因为词语中含有表示轻蔑等不符合当代社会精神的意义存在,在“老妈子、保姆、戏本、剧本、店员、营业员”等中分别选择了“保姆、剧本、营业员”。●

①见拙文《古词语的确定及其范围》,《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2(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1年,7)。

②学术界涉及到新词语确定的讨论大多以此为突破口。

③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版)上册,第32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4。

④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第250页。

⑤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第63页。

⑥解放后曾一度用“保育员”取代了“老妈子、保姆”可后起的“保育员”却没能流传下来。

⑦偶尔地,也有音译词战胜意译词而流行开来的,如音译的“逻辑”即是典型的一例,而意译的“论理学”等则鲜为人知。

⑧缩略式较之于原式,大多更为常用,更为社会熟悉。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式就是旧词语,如“欧罗巴洲”(欧洲)、“南中国海”(南海)、“南亚美利加洲”(南美洲)等。●

责任编辑:陶原珂

关于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

——兼谈学校公民教育的负效应

□周 燕

(广州师范学院教科所讲师,广东 广州 510400)

[关键词]公民教育 社会化 政治

[摘 要]公民意识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基础,“政治社会化”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而学校在青少年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7—0087—05

公民意识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基础。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的扩张。我国经历了漫长的没有公民,只有臣民和统治者的封建社会,在公民意识方面可谓“先天不足”,这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十分不利。青少年学生正处在公民意识形成和培养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公民意识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些共和国就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如法国,自 1883 年开始就根据初等以上学校的法令,在职业学校和一些初等学校里开设了公民教育课程。瑞士在 1894 年就在一些手工学校里开设了“祖国知识”课程。这门课程除了重复一些地理和历史知识以外,还包括思考公共的、州的和联邦的财政;思考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作用;讨论瑞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

国家的生产、工商业和同外国的贸易往来,甚至讨论全民投票和合理化建议的真实拷贝。①

据我们的视野所及,最早明确提出“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是德国学者凯兴斯泰纳(G·Kerschensteiner, 1912)。②就社会学的观点而言,公民意识的培养其实质乃是使个体人政治社会化。③公民教育即“使个人社会化,成为他所处的政治社团(包括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的一名合格成员”。④

“政治社会化”一词最先由 H·H·Hyman 于 1959 年在其《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一书中提出。政治社会化可以从社会层面(总体层面)与个体层面来界定。就社会层面而言,K·Langton(1969)认为政治社会化最广泛的意义,是指社会把政治文化由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过程。F·W·Frey 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团体、组织或社会灌输给其成员适当的态度和行为的过

程,包括有关的讯息与政府评价的灌输,也包括对权力的使用与分配应有态度的灌输。台湾学者林清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组成分子接受社会各类影响,形成其政治价值观及政治行为形态的过程。另一台湾学者叶学志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以教育培养人民获得对本国政治制度与角色的态度,趋向拥护与支持本国政治制度与要求。就个体层面而言,D·Easton & J·Dennis(1969)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取政治定向与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H·Eckstein(1963)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过程,经由这个过程,个人习得并内化价值、认知与符号;经由这个过程,个人也注入了有关政治运作的社会规范。L·W·Pye(1962)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过程,经由这个过程,个人发展其对政治环境的知觉,及获得其对政治事件的鉴赏、评断和了解。R·Levin(1963)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取政治团体、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相关的行为取向。这些行为取向包括对权力分配、政治规则的合法性和政治界的态度,决策和服从的类型,以及对团体效忠、敌对及刻板观念。⑤综上所述,政治社会化乃是个人经由各种社会化媒介,获得与政治有关的知识、态度、价值与行为模式,以适当扮演其在政治系统内角色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系统得以维持,政治文化也得以形成并传递。

在研究中,西方学者常采用以下政治社会化指标:政治涉入(political involvement)指个人对媒体使用、政治兴趣、投票意愿及与他人讨论政治事务的程度;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指个人觉得有信心、有能力影响政治事务的程度;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指个人对表达非传统意见、批评

政府及反对政府实施言论管制的接受程度。⑥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在1971年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公民教育比较调查,调查中所采用的公民政治态度量表由三组独立的因素群构成,包括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反权威主义、支持女权、容忍并支持公民的各种自由以及支持平等);支持本国政府(对本国政府的积极评价、响应政府提出的公民要求以及政府效能感);公民兴趣或参与(公民活动、参与政治决策和对电视的时事节目感兴趣)。⑦

由于政治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具体内容也因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而异。例如,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公民意识强调个人作为政治社会的成员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归属,侧重的是公民的义务。以J·洛克的思想为基础的公民意识则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侧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力。⑧在凯兴斯泰纳看来,公民意识包括权利与义务两个方面,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使国家的每个成员懂得国家的职能并使他们达到最高的个人效率,从而有能力也乐意尽最大努力担负起他们在国家组织中的职责。⑨1918年,美国学者英格利斯(A·Inglis)在其著作《中学教育原理》中提出中学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使个人准备将来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分子。为此,要培养起学生在重要的社会机构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生活中的公民活动、国家民族之主要活动、政治原理及政治义务等方面理想、标准及习惯的适当知识;使学生参加实际的学校及地方团体之各项活动,以培养其社会活动能力;启发社会意识及社会责任心。1938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教育政策委员会在题为《美国民主教育之目的》的报告中,提出公民责任的

目标包括以下 12 个方面: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y)、社会了解(Social understanding)、审慎的判断(Critical judgment)、容忍(Tolerance)、维护公共资源(Conservation)、科学的社会应用(Social applications of science)、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hip): 应是世界社会中的一个合作的分子、遵守法律(Law observance): 尊重法律、经济知识(Economic literacy)、政治责任(Political citizenship)、笃信民主(Devotion in democracy)。美国全国中学校长联合会于 1947 年在其报告《中学时期青年的基本需要》中指出: 所有青年需要了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并且乐于负起公民的责任, 成为社会中的良好分子, 国家的好国民, 世界的好公民。⑩ 1952 年, 道格拉斯(H·R·Douglass)在其所著的《青年生活调整之中学教育》一书中, 根据对美国自 20 世纪初至中期美国学者及团体提出的各种中学教育目标所作的综合分析, 认为公民资格包括个人参与家庭以外之社会团体, 如邻里、工作团体、休闲团体、市、县、州、国家及世界等。认为中学公民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成长: (1) 知识(Information): 关于政府、经济组织以及各种经济及政治生活问题的知识; 本国历史的资料, 尤其是关于本国国家发展的理想及其问题; 关于他国的人民文化、文学, 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政治方式, 以及他们国家的愿望企图等知识; 关于引起国家及地方的祸患与问题的知识; 关于个人与组织, 及足以阻碍民主与最大公共福利的知识。(2) 概念(Concepts)理解及原则: 例如有关法律与秩序, 原因与结果, 民主政治、人群关系的基本原理, 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等概念。(3) 习惯(Habits): 例如诚实及其他为社会所能接受的行为习

惯, 合作的习惯, 容忍他人之思考习惯; 为获得知识的阅读习惯, 及愿意参与活动的习惯。(4) 技能(Skills): 例如与他人合作相处的技能, 以批判的眼光阅读刊物及倾听个人或广播演说的技能, 以及带头领导的技能。(5) 理想(Ideas): 例如民主的理想——个人的权利, 言论自由, 公平而无私的审判, 生命和财产的保护; 有效而诚笃的政府; 公平竞争或处理, 不论种族、宗教, 而在经济及政治方面给予同等机会之思想。(6) 态度(Attitudes): 爱好民主的态度——如经济地位不同, 宗教不同, 国家或种族不同的人要有适当的态度; 对于社会要有服务的态度; 并且要有改进社会的态度。(7) 兴趣(Interests): 对于社区及团体生活各方面的兴趣——地方、州、国家及国际生活——包括读、听、及讨论的兴趣; 对于他人的福利与解决问题的兴趣。⑪

从上述公民教育实践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 公民教育内容已达成以下共识: 从内涵来看, 从侧重义务到强调权利再到责任和权利的辩证统一。从涵盖领域来看, 从注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到个人之间, 个人与家庭、学校(或其它组织)、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政治意愿的差异, 对于公民意识有许多可能的回答, 但可以找出一些共同趋势。M·Taylor (1994)的一项对欧洲国家主导价值准则的调查表明, 参加调查的 8 个国家按下述顺序排出它们的优先次序: 公民权利与义务(75%)、民主(63%)、民族意识(50%)、国际了解(50%)、环境意识(38%)、和平与宽容(38%)、人权(25%)、跨文化教育(25%)和反种族主义(25%)。⑫

学校对学生在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 学校教育对

于青少年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在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是政治学者,社会学者以及教育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早在 1961 年,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H·Wrong)就曾经提出“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人们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社会秩序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和谐的社会化的产物。人们常常感到被社会强迫着去做违心的事,这就清楚地表明社会化并不完善。他还指出,以往的社会化经验并不是简单地被相加在一起,而是由每个人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其融为一体。我们的社会化经验不一定是社会强加的,实际上有时候是我们选择了它们。^⑬正如 D·波普诺所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人就像木偶一样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过程来随意摆布的。社会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社会同样也是人的一部分。人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社会规则。^⑭过度社会化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的社会化理论的批判。尽管“过度社会化”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一致的内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过度社会化同社会化不足一样,都是对社会化标准的偏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者比后者对个体社会化更为不利,因为它的纠正需要转变观念和行为习惯,往往比学习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模式更为困难。迄今为止,以下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那就是个体与社会互相影响,个体很少完全由他们的社会文化塑造。在公民教育方面,我们是否也应该警惕“过度政治社会化”带来的负效应呢?

首先,在教育目标上,公民职责培养与工作人员职责培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公民需要培养采取批判态度、团结和对决策负责的能力,而在大多数生产工作中对工作人员的期望却是高度

适应重复性工作的例行操作和服从命令的能力。^⑮这里存在一个培养“公民”与培养“工作人员”的整合问题。

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内容上,学校公民教育中任何失之偏颇的内容取舍都将带来负效应。正如路易斯·阿尔瓦拉-贝特兰德(Luis Albala-Bartrand)所说:我们“一方面要界定什么样的学习过程和教育中心思想可能有利于民主政体稳定和政治效率所需出现或巩固的公民道德趋同的社会现象;而另一方面,它将导致自治人格的形成与表现,它是充实与创造的源泉,归根结底,是对自由的最有效的保证。”^⑯美国教育史学家伯斯(R·F·Butts, 1980)指出:公民意识的内容既要维护社会一致性(如正义、平等、权威、参与和个人对公共利益的义务),又要体现多元化(如自由、多样性、个人隐私、正当诉讼和国际人权)。^⑰公民意识是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自由意识与责任意识、国家意识与全民意识、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民主意识与权威意识、团体归属意识与个人主体意识等的对立统一。“现代思想和公民资格已不再是教育中须二者择其一的优先问题,它们已成为同一运动中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正如法因西尔伯(F·Fajnzylber)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公民资格和竞争之间无疑存在着紧张关系。但强调竞争而牺牲现代公民资格显然已经过时,就象注重现代公民意识而忽视竞争有些天真一样’”^⑱美国心理学家 K·霍妮指出,失去牢固传统的文化会向人们提出选择和协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问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会使人患精神病症。^⑲随着世界文化交往的扩大,缺乏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将在世界交往中迷失自我。因此,在公民教育中培养青少年对国家民族与本国文化的认同,产生归属感殊为

重要。但过分强调群体(包括家庭、学校或其它组织、社会、国家和世界等层面)的归属感,忽视个人主体意识的培养,将致使青少年缺乏对多元化、多元价值的选择与协调能力,从而造成其内心世界的极大困惑。

另外,也有学者对训练学生支持政治经济现状的公民教育课程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权力关系的隐性课程与公开的课程的目的是相矛盾的,它使不公正得以保持下去。^⑳

由上述情况看,学校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整合公民意识的多对矛盾。

从社会学视角考察学校公民教育的影响,更加注重的是实际效果,而不是法定目标。有研究发现:学校的公民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政治情感上,有时也会有出现负面效果的倾向,即中学生的公民知识愈高,愈少认同国家的情感,愈不信任政府,也愈多负面评价政府及政策的执行。^㉑另有研究表明:教育与经济保障水平的提高并未使公众对其政治制度更满意,对其领导人和政治机构更有信心,相反,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爱挑剔的民众,他们用相对苛刻的标准评价其领导人,对政治和经济权威甚至科学权威的服从越来越弱,而对建立负责的民主机构的要求呼声更高,这很可能使上层管理人士的管理工作日趋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教育又具有了一个新的更复杂的作用,即为参与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公民塑造更自主的人格。

在我们看来,上述负效应是由教育目标的不一致、公民教育内容的偏颇以及方法的失当等所造成的。在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包括目标厘定、内容选择与方法运用)中应考虑其负效应问题,并尽可能地予以避免。●

①②⑨[德]凯兴斯泰纳著、余强译《公民教育的目的》,载瞿葆奎主编、丁证霖等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⑧张人杰《略论公民意识的培养》,载《教育参考》1996年第6期,

④⑦⑰⑳胡森主编《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1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8页。

⑤㉑蔡璧煌著《学校与学生政治社会化—高职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教育社会学分析》,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⑥0·Ichilov,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Schooling Effects Among Israeli Adolescent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35, No. 3, 1991.

⑩⑪[台]林本《中外学者及团体对中学教育目标之研究》,载瞿葆奎主编、丁证霖等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

⑫切萨尔·伯尔泽亚(Cesar Birzea)《转型期世界的教育:界乎共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997年,第4期。

⑬[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⑭[美]D·波普诺著,刘云德等译《社会学》(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⑮胡安·卡洛斯·特德斯科(Juan Carlos Tedesco)《编者的话》,《教育展望》中文版1997年,第4期,第3页。

⑯路易斯·阿尔瓦拉-贝特兰德(Luis Al-bala-Bertrand)《专题论坛引言》,《教育展望》中文版1997年,第4期,第21-22页。

⑰埃内斯托·奥托内(Ernesto Ottone)《全球化与教育改革:现代思想与公民意识》,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997年,第2期。

⑱[美]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及特色

□ 冯增俊 马建国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讲师, 广东 广州 510631)

[关键词] 香港 公民 道德 教育

[摘要] 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由宗教教化、愚民教化、殖民伦理教化到回归前后的主权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80年代以来, 由于面临回归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学校公民教育及其教材的编写, 受到香港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和参与。其中有四个方面编写的教材影响较大并各具特色: (1) 香港廉政公署编写的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 (2) 面对香港回归的公民教育教材; (3) 香港教会编写的教材; (4) 香港学校独立编写的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7-0092-06

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由宗教教化、愚民教化、殖民伦理教化到回归前后的主权公民与道德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进入回归过渡期后, 香港的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发布了多种与公民与道德教育相关的“指引”, 如《学校德育指引》(1981年)、《中学生性教育指引》(1986年)、《中学生辅导工作指引》(1986年), 尤其是在1985年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基础上于1996年进行重大修订后颁布, 影响巨大。在香港, 为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制作教材的机构团体很多, 仅教育署就列举出25个, 但影响较大的当推廉政公署、教育署、各宗教团体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突破机构、救世军、香港童军总部、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等。这里仅根据教育署编制的教材目录, 选择了当下主要的机构和团体编订的教材为依据作相应的微观剖析。

一、香港廉政公署编写的学校公民

与道德教育教材及特色

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廉政公署主编的教材最为系统。廉政公署属下的社区关系处教育组, 自1975年成立以来, 已制作了一系列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七年级, 即适用于8—18岁青少年的德育教材。

廉政公署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分文字教材和视听教材两大类。小学公民与道德教育文字教材包括(1)《公民小先锋》(1988年)。这是一套通过不同级别、不同学科带出主题的德育教材, 共17课。教学对象为小四—小六学生, 主题包括: 责任、权利和义务。(2)《生活放大镜》(1988年)。这是一套以儿童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困惑为主题的广播剧, 内具三盒音带, 共20集。教学对象为小三—小四年级学生。主题为诚实、节信、公平、体恤他人。(3)《想一想》(德育辅助教材, 1988年)。书内载有20个故事, 并加上插图。故事内容围绕诚实、关怀

别人、责任感、交友之道、节俭等方面,每个故事结尾部提出“想一想”的问题,籍以引导小学生对故事作深入思考。教育对象是小四—小六学生。(4)《廉政公署小学德育教材应用指南》(1984年)。这是廉政公署为小学生设计的德育教材的小册子。内容包括填色习作、故事阅读、演说习作、书法习作、常识回答游戏及廉洁歌曲等,主题为廉洁、信实、仁爱、公德、互助、责任感。对象为小四—小六学生。

廉政公署为小学制作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视听教材包括:(1)《四十分》(1986年)(电影录像带)。对象为高小学生。主题有:勤力尽责、尊敬师长、友爱助人、诚实公平。(2)《星空》(1984年)(电影录像带)。对象为高小学生。主题有:责任感、互助合作。(3)《醒觉》(电影 1982年)。对象为高小学生。主题为诚实。(4)《松鼠宝西》(幻灯片 1984年)。对象为初小学生。主题为不要自私。(5)《雄鸡亚里士多图》对象是高小学生。主题为责任感。

廉政公署为中学公民与道德教育设计的教材包括:(1)《思与行》(1990年)。这是一套分初中和高中、共 20 课、适用于学校集会及班主任课的教材,内容包括角色扮演、字卡游戏、朗诵、流行曲、抢答游戏及个案研究。教育学对象为中—中五学生。主题为:自我的确立,权力的运用和归属感的探索。(2)《开拓人生路》(1986年)是一套有三个单元的多媒体教材。内容包括图画分析、配角游戏、分组研讨等,教学对象为中五—中七学生。主题为:了解自己的潜能,扩展自己的领域,以广阔的胸襟体会生命的奥秘。(3)《公平一二三》(1985年)。这套教材共 8 课,包括录像带等。教育对象为中—中三学生。主题包括:从家庭、学

校、社会三方面了解公平的意义;在家庭、学校及社会里,为保持和睦相处,宽恕、容忍和爱心等美德有时比公平更重要。(4)《财富人生》(1983年)。内容包括图片游戏、录音剧,影片分析、家庭开支预算表等。对象为中三—中五学生。德育主题为:平衡的生活、金钱的用途、善于理财。

廉政公署为中学设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辅助教材主要有:(1)《金钱以外》。教育对象为中—中六学生。主题为:从爱情、就业、友情等不同角度探讨《金钱以外》的丰富人生。(2)《启思集(一、二、三)》(1983年)。对象为中三—中七学生,主题为:性格发展、人际关系和价值观。

廉政公署为中学公民与道德教育制作的视听教育包括:(1)《伴我高飞》。对象为中—中三学生。主题为:自我的确立。(2)《浪卷千湾》。对象为中五—中七学生。主题有:了解自己,开阔胸怀,发展潜能。(3)《竞争》(电影录像带)。对象为中五—中七学生。德育主题为:竞争的利弊、对竞争应持正确的态度。(4)《脸》(电影录像带)(1981年)。对象为中三—中六学生。德育主题为:金钱、物欲、诚实、职业等价值观的澄清。

廉政公署编订的配合正规课程的教材包括:(1)《教学辅助教材》(1989年)。这套教材内容配合中学会考宗教科小组“个人与社会”课程,适用于天主教及基督教中学的中四—中五宗教伦理科学生。德育主题有:贪污、赌博、偏见等问题;金钱与物质的管理;家庭成员的关系与责任。(2)《廉政公署工作教学箱》。这是一套通过资料小册子、配音幻灯片、课堂学习带出的有关贪污问题的教材,配合政公科、经公科、社会科等正规课程采用。主要对象是高中学生。课程的主

题有：廉政公署的工作，反贪污法例及贪污行为的例子。

廉政公署的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有以下四个特点：(1)应用灵活。既可在一学年内采用整套教材，也可以选用其中部分单元；既可以配合正规课程，也可以在德育课、公民课、班主任课、集会和课外活动中采用。(2)着重启发式教育。教材选取的内容与学生有切身的联系，通过以“学生为本”的活动，帮助学生认识道德观念，继而引导他们发展道德判断能力，最后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力行，并将实践所得体验进行分析思考，强化所学价值观念，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品格。(3)教材采用活泼生动的教学法，趣味性强，学生参与活动为主。(4)教材内容覆盖了人类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道德规范，教育对象明确，符合相应年龄阶段学生的需要。

二、面对香港回归的公民教育教材及其特色

这方面，本文主要选取香港天主教教育事业处制作的《香港情·中国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与民主建港联盟联合编制的《基本法基础篇》、《基本法特辑—未来的主人》(录像带)以及“香港教育界关注九七联席会议”编制的《九七回归—备忘录》等教材为主。

1、《香港情·中国心》公民教育系列教材的内容及其特色。

这套教材共有 54 个单元，以国民教育为重点，初步分为高小、初中及高中三个程度，使学生从客观认识、感性和理性三个层面认识中国，帮助学生获得正确的国民民族观念，认同自己的文化，投身本地建设。

适用于小学的单位是通过生活的图画和图片，帮助学生对中国产生初步认识。例如，中国著名的风景、历史人物、

文字及成语故事等，培养学生认识和肯定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孝顺父母，以至贡献国家。

初中的单元，则着重于学生作为中国人，认识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与自己的联系。包括了解中港两地的密切关系；基本法与法治的关系；中国人对家庭和孝道的态度；香港居民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欣赏中国文化，以生为中国人为荣等。

高中阶段的内容以激发学生思考及培养判断力为主。例如，探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讨论中国人的优点和缺点，中西文化如何互补，一国两制的问题。凭籍这些单元，让学生了解、爱护香港，认同并尊重中国文化，了解香港、中国及世界关注的事情；了解民主、自由、人格及法治的重要性，在生活中运用并愿为香港社会及国家作贡献。

这套教材还提供了教学建议。各单元可以独立或渗透在多个科目中教授。教师也可按学生实际情况加入一些时事或校内发生的事件，帮助学生明白各单元的主题。要求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讨论，协助学生思考，在生活中运用所学的知识。

2、基本法公民教材内容及其特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和民主建港联盟编制的《基本法基础篇》和《基本法特辑—未来的主人》(录像带)公民教育教材套的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认识基本法，熟悉基本法，以便将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受永久居民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套教材有三个特色值得研究：(A)教材内容丰富、提纲挈领。整套教材分成 10 部分：“起草”、“序言”、“总则”、“中港关系”、“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社会生活”、“对外事务”、“护照及出入境”、“解释权和修改

权”。教师备课时,对 160 条的基本法得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并且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基本法。(B)图解醒目。《基本法》分成“序言”、“总则”、“其它章节”和“附件”四部分,眉目清晰,脉络分明。学生学起来不感困难。(C)问题富于启发性。“了解基本法从哪里入手?”、“哪些全国性法律在香港有效?”、“行政长官怎样产生?”、“立法局—立法会议员怎样过渡?”等等,这些问题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又可激发他们思考。另外,这套《基本法基础篇》还附“导言”、“目标”、“讨论问题”、“工作纸及答案”,提供教学指导,帮助学生生活学活用,巩固学习成果。

3、注重教育工作者公民教育的教材及特色

香港教育界关注九七联席会议编写的《九七回归—备忘录》一书,可说是香港教育界对教育工作者如何适应回归后的教育身份转移而进行的公民教育。该“联席会议”是 1994 年 5 月由香港教育工作者组成了一个民间团体,宗旨是拥护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精神,为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稳定而努力工作,先后召开过各种专题会,研讨过渡期的教育问题,该书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该书全面考虑有关香港的过渡情况,收入并解说基本法后,编入了中国的自然地理概况、少数民族、历史简表、法定假期、国歌、国旗、国徽、国家制度、主要领导人、历届人大、教育法、教育统计以及教育情况。主要特色为:一是注重教师的公民教育问题,尽量反映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国情,满足教师对中国知识的欠缺;二是注重中国教育的重大事件,让教师对教育大事有较好的了解;三是注重联系香港学校教育的实际,帮助教师顺应回归后教育工作的需要。这是一本面对香港

居民的中国公民基本手册,为最常见之知识。

三、香港教会编的德育教材及特色

香港各宗教团体都积极编写各种德育教材,主要是提供给教会学校使用,但也为不少社区学校所采纳。这里仅讨论两个宗教团体编写的并专供教会学校使用的教材: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由徐锦尧神父著的《伦理教程》和香港圣公会宗教教育研究中心出版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德育教材。

1、《伦理教程》的内容及特色

这套教材共分为六册。第一、二册称为《伦理初阶》分别为《蜕变》《成长》;后四册称为《伦理教育》,分别为《群居》、《探索》、《修身》、《新民》,策应中学各年级教学,由特定学校自己选择。作者认为,这套教程不仅可供中一一中七学生使用,也可供家长、教师、社会工作者、传道人及其他对伦理及公民教育有兴趣的人参阅。他指出,其教程不是要灌输什么知识,而是利用自然的方式,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编制的德育教材。如《群居》是以社会学为基础,《探索》是以逻辑学为基础,《修身》是以心理学为基础,《新民》则以政治学为基础,但核心都是阐述德育问题,目的是启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和社会问题进行较深刻的审视,从中获得正确的伦理原则,确立人际关系和个人修养方式,培养良好性格,做一名好公民和有道德之才。

该教程的主要内容有:《蜕变》以主题方式,探讨走入初中阶段的学生如何求学、交友,接受家庭文化与性教育,认识大众传媒、公民权利与义务、时代剧变及祈祷、美德、宗教与生活的时代意义。《群居》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探讨培养群体意识,确认人与人互相依存和彼此影响的事宜,并研究学校、家庭生活问题以及

青少年犯罪问题。《探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如何排除偏见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并对每个行为都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修身》注重心理学分析,教人认识自我,达到自律,探讨人生和生活的意义,并用孙中山先生为榜样来加以阐明。《新民》中一是介绍民主的基本知识、民主制度、民主人素质、参考权利和义务,民族感,二是介绍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特质及优劣处;三是介绍耶稣及圣经的时代意义。

该教程在香港影响较大,有三大特色:(1)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和德育根源,突出社会公益和发展全人的互动性,力图通过圣经布道来指出人生理想,具有很强的理性阐释。例如,《蜕变》中的“我的情绪”这一章中,先由诗歌作引,导入概念,再讨论情绪问题,进而教学生认识情绪和疏导及如何化解情绪,再举例说明,并鼓励实行,最后用《圣经》语句来概括。(2)以生活为中心,从生活角度来谈论圣经问题,把生活、人生与信仰结合起来,坚持先生活后信仰,信仰反作用于生活的原则,坚持信仰与生活必能彼此协调、互相发扬等原则。(3)图文并茂,约有300多幅漫画和照片,实际与理论相融,从事例,到说理,到公德规范,再到日常行为准则要求,再到有关练习,最后是有关参考资料。

2、《宗教教育课程》的内容及特色

该教程由香港圣公会宗教教会编制,为香港宗教界颇为知名的德育教材。《宗教教育课程》分为幼儿、小学及初中三部分。幼儿部分为《天父世界》,教材的编写目的是提供一套適切儿童使用的教材,用平实易懂且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宣扬基督教信仰。教材取意于新旧约圣经,并进行实际生活化处理。幼儿宗教教育分幼儿班、幼稚园低班、幼稚园高班

3个班。幼儿班上学期6课,下学期8课,后两班每学期均为9课。小学部分为《完美人生》,其中一年级为《天父世界》和《感谢天父》,二年级为《我的小小世界》和《天父的好孩子》,三年级为《爱的使者》和《生活如光》,四年级为《爱我的耶稣》和《上帝与我》,五年级为《传到万邦》和《美好见证》,六年级为《生活在信仰中》和《完美的人生》。教程中的主题涉及到生活和天国的各个方面,如《天父的好孩子》中有好儿童、好仆人;又如《生活在信仰中》中有教会的生活、事工、信仰等。中学部分为《同创新天地》,共三册,每一册均分三部分:宗教背景、圣经人物及信仰生活,但各册有不同的内容。

这三套教程组成整个宗教教育课程,每一年龄段课程的教材均由学生课本、教师手册、活动教材以及视听教材等教材套组成,整套课程围绕着传教信仰的主题展开,从浅及深,到中学部分已进入较全面探讨圣经及耶稣信仰阶段。与《伦理教程》最大不同的是,该课程强调先有信仰后进入生活,生活支持信仰,在逻辑上两者是相反的。但是,把信仰与生活相结合,则两者都是一致的。

四、香港学校独立编写的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及特色

香港圣公会主风小学编写的《公民教育素材特辑》,可说是香港各学校根据《指引》编写德育教材的代表之一。该教材后被圣公会宗教教育中心改编为《公民教育素材》教材套出版。该教材是主风小学进行3年教改尝试后进一步修订而成。他们认为,以往的班会不可能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道德说理和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更有计划、更系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他们还注意到,在一所学校中同时进行主

题一样的但程度不同的价值观教育,有助于不同阶段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辅导,社区学校更是如此。从这一考虑出发,设计了三项 14 个主题的公民教育课程,个人方面:慎始、谦虚、自律、清洁、勇敢、反省;人际关系方面:爱心、礼貌、合群、互助;公民意识方面:公德、权利与义务、正义感、责任。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一六年级的不同教学重点,如自律,在一年级为“使学生认识和学习自律的行为”;而在二年级为“使学生在没人督促时仍然能够做出正确的行为及通过填色活动,使学生知道哪些行为是他们自己做得来的”;三年级为“让学生明白失却自律的人也是一种自私的人,以及让学生分辨出哪些是自律的行为”;四年级则为“让学生明白自律是要自发地去做,不需要别人监管的,及让学生明白在生活中怎样做才是一个有自律精神的孩子”;五年级为“让学生明白自律和被律的分别,和培养学生养成自律的习惯”;六年级则“让学生明白自律需决心、恒心和不断反

省的心,及培养自律的精神”。

圣公会宗教教育中心 1992 年改编出版这套公民教育课程时,基本上沿用原有的体例,但分为“学生本”和“教师用书”两种。课程特色:(1)注重公民教育与学生经验的结合,把德育与学生可接受的各种生活、故事、游戏结合起来,让学生从实际活动中学习,努力通过活动引出主题,引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积极投入;(2)内容编排注意循序渐进。教材考虑到不同学生心智发展的特点和需要,以 14 个德育主题展开,形成螺旋式循序渐进之势。(3)图文并茂,形式多样,设计灵活。

香港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丰富,仅举以上各种,也已略知大概。目前香港教育署正组织力量根据 1996 年颁布的指引编写正规的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并拟逐步从选修课向必修课过渡。可以想象,这将会极大地促进香港学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的发展。●

责任编辑:陶原珂